

政治學報

No. 8

出版者：政治學會

主編者：南洋大學政治學會出版部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Political Science

(慶祝本會二周年紀念特輯)

日期：一九六一年九月

定價：二角

主席的話

·陳文藩·

政治學會在副校長、老師和本會顧問的指導，以及各執委和會員們的極力支持和擁護下，她已順利地渡過了兩個年頭了。首先，讓我們以興奮的心情來慶祝本會二週年紀念。

本會正式成立的當兒，正是星洲人民經過了一系列洶湧澎湃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以後，實現了有限制性的半內部自治權的日子。兩年後的今天，本會也在原有基礎上向前跨進一步，爭取更大的成績，同樣地，星洲的憲制地位也即將提出檢討。我邦人民不斷強調：只要殖民主義勢力還盤踞在我邦的一天，人民的基本願望是絕對不能實現的，唯有改變殖民地性質的憲法，積極展開反殖民主義鬥爭，才能爭取更大的自由和民主權利，澈底剷除殖民主義勢力；勿庸置疑的，1963年或較早的新英憲制談判，除非人民能夠澈底清除殖民主義勢力，實現一個自由、民主、獨立和統一的馬來亞，否則，最低限度應爭取實現完全內部自治權利，廢除內部治安委員會，取消不民主的憲制條文，以便為實現一個真正獨立和國土統一的馬來亞鋪平道路。同時，凡與星馬兩地人民的政治前途有極密切關係的「合併」問題，應被提交由星馬兩地人民進行廣泛和縝密的討論和研討，才作最後決定，若以草率從事，或置民意于不顧的態度來處理「合併」問題，必遭人民反對，最終必定失敗的。

政治學會是一個研究政治問題的學術機構，它一路來的工作全依循着會的最高宗旨——發揚學術研究精神；同時堅持着愛國主義的立場。

正如本邦楊教長去年給予我們的獻詞所云：「其實政治也者，簡單說一句還不過是眾人的事罷了。只要人類羣居聚處，就不免有政治這一回事，政治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怎麼可不談它呢？」

舊的統治者為了把政治變為他們的「專利品」，不許人民談政治；目前有些統治者為了鞏固本身權力地位，却強制人們談他所喜歡或主張的「政治」問題，不許人民表示不同政見。我們認為兩種表現都是出自於相同的目的，就是限制學術研究的自由，它對人民的思想絕無裨益。

正當人民處在爭取祖國真正的獨立和國土統一的浪潮中，學術研究自由的權利與風氣應該得到承認與發揚，愛國主義的思想更應受到充分的重視與發揮。

過去，我們曾和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以及工藝學院政治協會二兄弟團體聯合發表聲明，這是大家對於本邦政治局勢研究之結果的公佈，以供人民研究政治局勢的參考吧了，今後本會不論是舉辦座談會、演講會、出版刊物或研究政治問題，我們都會本着一貫宗旨和立場來展開任何學術性的活動。

政治學會今後展開政治問題的研究工作所遇到的困難將是難免的，但是，我們深信，只要大家能秉承着過去一貫互助友愛的精神，緊密地團結在會的周圍，一切困難必能克服，政治學會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燦爛的。

副校長獻詞

莊竹林

本大學政治學會成立迄今二年，其間除發刊政治學報外，並邀請名人演講，或舉行座談會，頓使我同學對於當今政治問題多所認識，更使我同學團體生活多姿多彩，洵盛事也。

惟念星馬兩邦在政治上或方實現獨立民主，或僅實行內部自治，我人民對於民主政治之素養既極貧乏，於民主制度之運用，自亦未能盡如人意。一般民眾甚至諱談政治，以為明哲保身之義，誠屬可憾，此固由於人民對民主政治尚未充分認識所致，而當局者流未能廣開言路，或甚而壅塞之，乃其基本原因。須知政治之良窳，直接影响人民之生活，倘不能使其對於切身之政治問題，儘量發揮意見，則無以知其對於政府施政之反應，亦即無以測知民心之向背。古人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如不在平時善為積極之宣導，而僅從事於消極之防範，一旦大選屆臨，或則眾叛親離，或則一敗塗地，前車之鑒，豈偶然哉？

本大學為開風氣之先，於創辦時，即有經濟政治學系之設立，旨在使我同學對於現代政治問題能多所關注，亦鑒於落後地區人才貧乏，尤以久在殖民地統治之下一般均抱功利主義，以修習法律，醫學為致官之階，而對於政治或其他社會學科，每視為最無出息之冷門。本大學為打破此不正常之觀念，乃於政治經濟學系中多開政治學科，原亦冀能挽回此錯誤之傾向，並能為國家廣育政治人才也。詎創辦以還，修習此科者既未見踴躍，而向外界對於肄業此科者或且以疑慮之態度視之，甚至進而對於該科畢業生之欲投入文教方面服務者，亦加以限制，此誠非本大學創辦該學系始料之所及，不無遺憾焉。

孫中山以為：「政」，眾人之事也；「治」，管理也；所謂「政治」，乃管理眾人之事也。現代民主政治實為全民政治，亦即所謂民治、民有、民享也。故中山之說，與歐美民主政治之最高原則適相符合。我政治學會諸同學既對政治原理能潛心研究，又藉集會與刊物之介紹，對於政治問題從事學術上之探討，以鼓起同學對於政治之興趣，並進而提高一般民眾對於政治之警覺，其志可嘉，其功尤不可沒。

惟鑒於目前政治問題之複雜性，亦令人不禁為之微惕。本大學創辦之初，即以無政治立場無黨派色彩為辦學之宗旨，良以本大學為一純粹學術研究之機構，旨在作育人才為國宣勞而已。凡我同學當能體念及此，對於政治學術之研究能努力不懈，對於當前政治問題能保持濃厚之興趣，對於與政治有關之客觀條件亦能密切注意，藉以加深對於政治之素養，俾能在畢業以後有更大之貢獻。英美各大學在校學生每有影子議會與影子內閣之假設，在求學時，一面從事政治學理之鑽研，一面試行議會之演習，故大學生畢業以後，即能用其所學，充實其國家政治上之陣容，推進政治上之效率，其用意有足多焉。本人深望諸同學勿忘目前尚在求學時期，一切活動仍以學術有關者為重，研究政治之原理，注視政治之實施，討論政治上之問題，均無不可，惟切勿以談政治而參加政爭，並進而陷入政治之漩渦，有厚望焉。

兄弟團體來函祝賀

我們恭祝南大政治學會第二週年紀念刊的出版。

你們出版的「政治學報」有着非常重大的意義，同時亦深受廣大讀者的熱烈支持。

政治學會與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的兄弟般的情誼，永遠是深厚的，所謂受華文教育者與受英文教育者必須處在兩種不同生活領域的謬論，是不值得一駁的。

我們希望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咱們的團結會更加緊密。

將來的更進一步的合作，有賴於咱們兩個學術團體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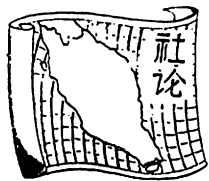
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秘書周砥
(R. Joethy)

無可否認的，在民主社會里，公眾的意見有極其重要的作用，這尤其是在新生的星加坡，其民主政府時刻要遭受嚴重之考驗。要使民主制度有效地為廣大人民的利益服務，就必須能更有效地反映公眾的意見。

貴會以往的活動都已說明貴會成功地完成此項反映公眾意見的重要任務。

謹此，我代表工藝學院政治協會恭賀貴會的成就及此特刊的出版。

工藝學院政治協會主席洪文昌
(John Ang B.C.)



尊重民意·舉行大選

(一)

新加坡淪為英國的殖民地，這是全民所痛心的事！我們不能眼見新加坡的同胞永遠生活在殖民統治之下而無動於衷，凡是愛國的人士都要爭取擺脫殖民統治，實現馬來亞領土的統一。

當前新馬的執政者，是否像印尼政府那樣反對殖民主義的佔領領土，並為國家的統一而展開鬥爭，讓未來的歷史家去評判吧！不過，我們總覺得：能夠基於平等、合理的原則來達到國家統一的任何方法，兩地的執政者至少不應予以放棄。

(二)

從三個月來關於合併問題的爭論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出：行動黨政府處理合併的態度，不能令全體人民感到滿意；執政黨所提出的合併條件，各階層各黨派都表示異議。

誰都知道，新加坡的前途，關係着一百六十萬人民的命運，絕不應交由某黨某派去單獨決定。執政黨在處理合併的問題上，顯得草率急躁，當她還沒有徵得各階層各黨派的表示一致同意之前，就匆促的和聯邦政府經過「三個月」的「私下談商」，最後雙方聯合發表公報，表示兩地政府「在原則上贊同合併」。消息一出，各政黨紛紛表示不滿，認為執政黨處理合併的「密謀不公」及「獨斷獨行」的態度，既欠公平復無民主。

勞工及教育政策的自主權，是執政黨所堅持的合併條件；而確定新加坡未來的憲制地位，却是其他各政黨的一致要求。其他政黨認為：假如新加坡的地位沒有肯定，勞工教育的自主權便無從談起。四角聯盟責備執政黨濫用「合併」之名，行其「假邦聯」之實；此外，自社黨、統一黨、工人黨、人民黨及新成立的社陣，也相繼指責執政黨的「合併」其實只是「假合併」，並對合併的兩條件大加攻擊。正如社陣所指出的：如果在民主、自由這方面，必須由人擺佈，那末，所謂勞工教育政策的自治，到底能值幾分錢？！

(三)

按照國際通行辦法：兩個不同的政治單位，若要基於平等合理的原則進行聯合，可通過「邦聯」的過渡形式，以便最後達到「聯邦」的真正結合。以馬來亞來講，兩地的真正結合，即意味着國家領土的統一。至於「大馬來西亞計劃」，根本不應與新馬的統一混為一談，它目前只能通過「邦聯」的聯合形式，來加強新馬與北婆三邦之間的聯繫，絕不等於使馬來亞領土的恢復統一。

假如新馬通過「聯邦」形式而統一，聯合邦必須修改憲法，讓新加坡成為馬來亞的一州，各州按人口比例選派國會代表，新加坡的公民自動成為聯合邦公民，全體公民的義務與權利均等，所有這些，都是無須爭執的定論。「共產黨」是否也提出這樣的主張，我們不懂；可是，世界上任何「民主地方」的「民主人士」，都不能不承認義務與權利平等的原則是合情又合理的！

認義務與權利平等的原則是合情又合理的！

如果新馬通過「邦聯」的形式，作為合併的過渡安排。那末，根據「邦聯」的真正內容，新加坡不但要擁有勞工教育的自主權；更須掌握完全內部自治權（特別是治安權）。至於她的外交、防務等，應由兩地政府締結協約來共同處理或將之移交予聯合邦。

根據社副總理致各政黨的函件指出：行動黨所安排的合併，是新加坡以州的身份併入聯合邦。但是，基於以上我們對「平等聯合」的分析，不難看出：根據執政黨所提出的合併兩條件，若要使新加坡「以州的身份併入聯合邦」即組成「聯邦」嗎，就少了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權利；若要達致「統一的過渡」即「邦聯」呢，又缺了「完全的內部自主權」。這樣一來，既不能組成「聯邦」也不能達致「邦聯」，新加坡的平等地位是無從談起的。

倘若新馬採取不合理又不平等的「保護」或「宗廟」的關係而聯合，那時，「受保護國」或「附庸國」的新加坡頭上，將騎着「保護國」或「宗主國」之聯合邦的右派，再上又有着殖民統治者盤踞，從此，新加坡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權利，一定遭受雙重剝削，縱使擁有勞工教育的自主權，無異只是一張廢紙。可以肯定：不但新加坡人民要反對這樣不合理的「合併」；聯合邦的人民也同樣不能忍受自己的同胞遭受雙重迫害。

有關合併問題的談判：是新馬與英國之間的談判，必須三方同意才能達成協議。當然，我們對統一的爭取是不許放鬆的，但是，三方的談判絕不能用來拖延或迴避1963年的新英雙方憲制檢討的談判，因為後者是在憲法上明文規定的談判，除非在新馬的合併問題上，三方能在這兩年內達致「聯邦」的新馬統一或「邦聯」的過渡統一的協議；否則，1963年的談判，我們至少應從殖民統治者手中爭回「完全的內部權力」。我們認為：聯合邦政府曾在本屆聯大會議時和亞非集團共同發表「結束殖民統治」的宣言，所以她應歡迎新加坡人民爭取擺脫殖民統治的鬥爭；至於新加坡的執政黨，早就對現憲制表示不滿，視之為「三項古」的自治憲制，現在，更沒有什麼充份的理由來反對爭取「完全自治」的要求。

(四)

「聯邦」、「邦聯」及「完全自治」等憲制改進的要求，一概是為了進一步擺脫殖民統治及爭取祖國統一而提出的，所以，要實現這些要求，首先要依靠人民的反殖力量；尤其是「聯邦」或「邦聯」若要兌現，更非取得人民的同意並動員羣眾去爭取不可。因此，有關合併的條件是否合理，執政黨必須聽取民意；而人民也完全有權利表示他們對合併計劃的意見。假如不承認這種起碼的民主權利，一味叫喊，說誰提出意見誰就是受「共產黨」的支配，如此作法，未免近乎專橫武斷，我們希望執政黨不至於出此手法。

其實，今天不同意行動黨的計劃的，是來自各個方面，幾乎除了執政黨以外，所有大大小小、左左右右的政黨，都包括在內，他們認為新馬合併的大問題，人人都可提意見，而且還須將之交由人民決定。所以說：對執政黨的合併計劃表示異議，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則其精神可嘉，何罪之有？！

(五)

人民當初選了行動黨執政，只能證明人民對她的爭取新馬統一的原則是贊同的，並不能說明有關統一的安排，應由行動黨包辦。其實，「大家都知道合併是不可避免的」，各個政黨都不反對「合併」，所以，選民並不只是基於「爭取合併」的原則而支持那一政黨是極明顯的。現在，執政黨經兩次補選失敗後，因政治路線的爭執而引起分裂，致使她在立法議會的地位極其險惡，在人民羣眾中威信直降，同時，各黨派對其計劃既不表同意，而民間輿論對合併內容又多所懷疑。這樣，假使議會硬行通過並接受執政黨的合併計劃，是不是抹煞人民公意而一意孤行呢？值得三思！

李總理曾在七月十日安順補選的街頭大會上說過：「我們不是打鑼鼓賣膏藥的，我們希望行動黨有百年的歷史……合併這個問題必須弄清楚，並且要讓人民作最終主事，合併交由人民決定是當然的，決不是由幾個部長決定。」對的！合併必須交由人民作決定。但必須指出：如果只是在議會里草率通過合併計劃，然後才向老百姓「解釋解釋」，那便不算「功德圓滿」，不是交由人民決定。

(六)

行動黨曾在七月十日指出：在一適當的時候光榮的把委任狀交回給人民。七月十九日接着說：這一次安順補選行動黨沒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恐怕在1963年之前就會舉行大選。可見，「交由人民決定」的辦法，應該是舉行大選，我們知道：當瑞士各邦進行「合併」時，先後在1848年及1874年舉行各邦的全民投票，把「合併」的事，「交由人民決定」。

就理論上說，我們既然知道「合併」是不可避免的，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處理「合併」時便須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要知道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那就得問問推動歷史齒輪的巨人——人民羣眾。

我們的社會成員里，佔絕大多數的是進步的人民羣眾；也有極少部份是倒退份子。廣大的人民羣眾要求統一；少部份倒退份子却要在「合併」的問題上大開倒車。

因此，要知道符合歷史發展的「合併」是什麼？要瞭解廣大羣眾所要求的「合併」是什麼？新加坡就應來一次全民選舉，通過議會民主的競選方式，讓各黨派人士把他們的計劃清楚明確的提出來。那一個計劃符合歷史的要求；那一個政黨得到人民的愛戴，由人民作明智的決定吧！

馬來亞聯邦聯盟政府已經自毀其「准許方言學校正常發展」的諾言了！

聯邦華校教師會總會主席林連玉先生之公民權被褫奪，及教師註冊証被吊銷，充分地暴露了聯盟政府歧視和消滅民族教育的政策！

林連玉先生被剝奪了兩項權利，再一次引起了全馬愛好自由和爭取民主權利的人感到不安，而且對聯盟政府不顧及民主精神的措施，感到無可彌補的惋惜！

聯盟政府對林連玉先生所採取的行動，是直接地威脅到華文教育界人士的職業和人權的保障，及造成民族教育的嚴重危機！

事情的真相是非常明顯，由于林連玉先生自1951年聯邦華校教師總會成立以來，即成為該會十分出色的領導人，領導聯邦華校教師堅決走維護民族教育的路線，並善于與各階層人民合作，阻止了殖民主義者在消滅民族教育的1952年教育法令與1954年教育白皮書的實施，及解決了威脅華文教育的存在和發展的其他問題。在聯盟政府執政後，對其所頒佈的1956年拉昔教育報告書，1957年教育法令，及其他危害民族教育的措施，華校教總也都依據憲法中有關語言和教育的條文，並基于不妨礙巫語成為聯邦國語的原則下，針對有損民族教育的存在和發展之點，提出不少良善的意見和嚴正的批評。但是，1960年達立教育報告書，聯盟政府歧視民族教育不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變本加厲，要華文中學在變質的條件下接受全部津貼，否則，只有讓獨立中學存在(?)，不被津貼，這一着，顯然引起聯邦人民普遍的不滿。華校教總在被迫得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只好本着一貫的精神，決定從獨立中學作為現階段維護民族教育的步驟。

聯邦華校教總一路來的立場，是明確的。單從華校所採納的三種語文教育為例，就充分地說明了該會不但沒有反對巫語作為國語，同時對推行國語的熱忱，是遠較其他民族集團認真。可是，令人惋惜的是聯盟政府完全不了解華校教總的明確立場，反而一意推行其既定的教育政策——重視英語教育，輕視巫語教育，消滅華文教育（包括印語）——而毫不考慮後果地向聯邦華校教師會總會主席林連玉先生開刀。實在使人遺憾！

聯邦華校教總一路來是堅持華人對教育總要求的三大原則：（一）各民族教育均以母語母文為主要媒介，（二）各民族學校教育一律平等，（三）促政府設立「華文教育諮詢委員會」。這三大要求，是于1959年4月26日由全聯邦7百47單位華人註冊團體及學校代表在全國華文教育代表大會上通過的。華人對教育問題的要求，是合情合理，切實可行的。但聯盟政府不僅不加考慮，反而一面拒絕，一面向林連玉先生採取行動。所以「林連玉的事件」，並非個人問題，而是聯邦人民的民主權利及整個華文教育的問題。

根據報導，聯盟政府對付林連玉先生所依據的理由，可歸納為三點：

（一）「自從1957年以來，他即通過自己的言行，表現對聯邦的不忠誠和不熱愛。」

（二）「他混亂政府的教育政策，可能引起人們對國家元首和聯邦政府不滿的情緒。」

（三）「做出極端的種族主義的呼籲，可能引起聯邦各民族之間的誤會，以致最後造成騷亂。」

這三個理由，總括起來就等于這樣的一個定律：凡對不合理的語言教育政策提出意見的人，就是種族主義者；只有盲目追隨不合理措施的人，才算是聯邦忠誠的子民。

林連玉先生被令解釋為何不應被取消公民權，及教師註冊証已被吊銷，便是這個「定律」所判下的極刑。幾年前，林蒼佑醫生卸去馬華公會會長職，及朱運興先生失去教育部長職，明眼人皆能察出這是因為他們兩人對華文教育問題表現了比較明確的立場。又最近馬來人賽·查哈利被解除馬來前驅報總編輯職務及被永遠禁止其進入聯邦，也是因為他負責該報重職時期對聯盟的英文至上的教育政策有批所評。僅僅從這些人的事件中，已够說明了民主和人權的意義在馬來亞是已經被摧毀了，所謂要使馬來語成為我國最廣泛的教學媒介語，只不過在掩飾發展英語教育及最後消滅民族教育的手段。

那麼，在爭取事先發展國語及合理的給予民族教育有發展機會，是不是就變為種族主義思想呢？是的答案永遠找不到的。相反，動不動就高喊種族主義的人，才難於令人相信他就具有真正的馬來亞意識。1959年4月26日，林蒼佑醫生曾經指出：「教育問題，在本國各民族之間，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我們在爭取華文教育的地位的努力，經常會碰到頑強的阻力，這種阻力，就是來自狹隘的民族意識。」

這即是說，指責爭取民族教育平等待遇是非馬來亞觀念的人，其本身就有種族主義思想的嫌疑。而幾佔馬來亞人口半數的華人，却被迫放棄其母語教育的權力，是太荒謬無稽的。馬來亞聯邦憲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第一項已有明文規定：「聯邦之國家語文為馬來語……但(A)任何人不得被禁止或阻止其使用（官方用途除外），教授或學習其他語文，且(B)本款不得妨礙聯邦政府或任何州政府保存並扶持聯邦其他種族語文之使用與研究。」因此，不管從情理或法

理的角度來衡量，把種族主義加諸華人身上，是一種知法違法的作為；而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林連玉先生的身上，是一種過時的手法，妄想通過政治壓力去壓制聯邦華人對華文教育問題的合理要求，進而履行1960年達立教育報告書所擬定的華文中學改制的步驟。這種做法終要遭到失敗的！

在歷史上，沒有任何一種壓力能夠摧毀人民爭取民主和人權的理想；同樣地，聯邦華人在爭取母語教育的合理地位的願望，也不是任何壓力可以使之屈服的。「林連玉事件」雖然引起了民族教育的嚴重危機，但是這種危機只能暫時挫折民族教育的發展，而製造這種危機的人，將會受到人民嚴厲的制裁，歷史將會給予決定性的判決！

「林、賽事件」說明了什麼？

在國慶日的前後，不幸地發生林連玉先生之公民權和教師註冊証被褫奪，以及賽·查哈利先生被禁止進入聯邦之事件，普遍激起社會各界人士之關注與焦慮！

林連玉先生是聯邦華校教師總會主席，一貫極力主張各民族教育平等，堅決反對壓迫和歧視民族教育的政策。賽查哈利先生是巫文前鋒報總編輯，此次和該報全體職工，為了反對把巫文前鋒報黨化，羣起捍衛我國新聞自由而罷工！這兩位文化工作者，因此，受到政府如此不合理和不民主的對待。雖說受遭殃者是林連玉先生和賽查哈利先生個人；可是，此次的事件却影響及國家的民主和人民的自由問題，這怎能是我國所有熱愛民主與自由的人民所能容忍的呢？又誰怎能不為隨時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慘厄運而感到焦慮與憤恨呢？

聯盟政府時時欺騙人民以及常常向外國人誇耀說：馬來亞是多麼民主，人民是多麼自由和幸福！我國人民也時刻都在希望馬來亞是個民主與自由的土地。然而，無情的現實和赤裸裸的事實，說明了聯盟政府有隨時並任意逮捕人民、封守新聞、褫奪公民權……等等自由權利；人民也就只能過着受欺凌與被壓迫的自由生活，「多麼自由與幸福呀！」——這是多數人的痛苦與不自由帶來少數人的自由與幸福。這種種，人民不只在一切事件中清楚地看到，更在實際生活中深刻地體會到，他們時刻在痛苦地呻吟着：何時才能擺脫悲痛的生活呀？緊急法令廢除前與國內安全法令施行後，人民的感受是一樣的。

民主自由與賽·查哈利事件

聯邦首相東姑阿都拉曼於九月四日簽發禁令，永遠禁止馬來前驅報編輯，馬來新聞俱樂部及馬來亞記者公會主席賽·查哈利進入聯邦。賽·查哈利至星洲是為了把星洲人民支援馬來前驅報罷工工友的款項帶回吉隆坡，返途中就在新柔長堤被禁回吉隆坡。

這一事實，非但在馬來民族社會中感到震驚和起着極大的反響，同時也為華印民族所關注與同情。

首先，這事件使人懷疑馬來亞所標榜的民主程度是怎麼一回事，東姑曾對記者說明他的政府一向是給與任何人以極大的自由，他批評賽·查哈利的妻子說：「要是她真誠地向政府請願，政府是會給與同情考慮的，可是她不然，她以恐嚇手段威脅政府，她這麼做法，政府是不會低頭的。」從一段話裏頭說明了聯邦政府的做法是不合理與隨意剝奪民主自由的面目。所謂「真誠地向政府請願」不過是意味着向政府妥協，否則「政府絕不低頭。」也正表明賽·查哈利是不會危害聯邦公眾秩序，他的危害性祇是不顧對聯盟政府趨附勢，不為利用罷了。

其次，這事實的發生是與馬來前驅報的罷工事件密切聯系着的。馬來工友們為了捍衛新聞自由與獨立的性質所作的正義鬥爭，

請問國內的安全法令被引用過多少次？多少人民被隨心所欲的逮捕？人民之公民權如何被輕易地褫奪？人民的旅行和新聞自由權又在那里？還有……這一連串的問題，揭露了聯盟政府偽民主的醜惡面目！只要國內安全法令繼續存在一天，馬來亞的國土就永無民主和自由之味道，人民又怎能從國土上吸得民主與自由之氣息呢？

因此，我國各民族同胞會清楚的認識到：當前我國社會的基本問題是政治的民主問題，而不是什麼種族主義問題，因此，各民族同胞所受的壓迫，根本上是來自政治方面，而不是來自民族間，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壓迫，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在這樣不民主和不公平的社會裏，不管你是華族的林連玉，或巫族的賽查哈利，或印族的……等等，都隨時要碰到共同不幸的遭遇，以及受到壓迫和欺凌，大家的命運是相同，遭遇也是共同的。

林連玉先生和賽查哈利此次的遭遇事件，深得各民族同胞的同情和關注，巫文前鋒報職工罷工期間，不僅得到各民族同胞的熱烈支持，而且獲得經濟物質的援助和生活各方面的照顧，這些活生生的情景，以及種種動人的場面，是各民族同胞發揮互助和友愛精神的具體表現，也將是今後我國各民族同胞，為捍衛基本人權，爭取共同利益，實現一個民主，自由和公平的社會，而並肩奮鬥的好模範！

· 芬 ·

贏得了廣大馬來同胞的支持，對於政黨企圖控制報章，成為單純為政黨服務的御用工具的做法予以有力的打擊。東姑雖然宣稱禁止賽·查哈利入聯邦的事與馬來前驅報的事件無關，但事實畢竟很清楚地表示出來，這兩種事件的聯系不是神話，更不是天緣巧合，它只是聯盟政府抹煞新聞自由表現為一種對個人自由威脅的一連串具體事件。

正如馬來文化永久理事會秘書胡申在印刷業職工聯合會四十九週年紀念會上所說的話：「在我們反對馬來資本家而進行鬥爭中，我們得到來自華印族的支持與援助。」聯盟政府實際上大大地脫離了馬來民族的利益，它所施與的恩惠只及於少數馬來上層分子，賽·查哈利為第一位馬來人被禁入聯邦，由此可看出馬來亞民族的生活自由不受保障（公民權隨時隨地被吊銷，使公民權成為政黨壓迫、威脅人民民主自由的工具），聯盟政府之不能代表馬來亞民族與維護馬來民族利益是顯而易見的，馬來民族也正如其他各民族廣大勞苦大眾一樣是處在同一地位。

馬來前驅報的獨立性質，不受政黨影響的本質是應該受到維護，扼死雄雞怕天亮的做法是愚蠢不過的事。

· 影 ·

大漢沙文主義及其他

楊 航

新馬是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因此，雖然不值長篇聲討，還須一駁。從最近幾世紀以來，都是一個由外來民族統治的殖民地，因此，在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各種民族間的恐懼和不和，本質上都是殖民統治和民族壓迫下的結果及其所產生的副作用。怎樣把民族間的恐懼和不和澈底解決，固然須待殖民主義勢力的清除及人民當家作主以後，然而把這些不和與恐懼減少到最低限度，應該是任何政黨，特別是執政黨所必須努力實現的重要任務。

玩弄種族政治

我們知道：我國民族間的矛盾衝突是不會有可靠基礎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國領土小，民族間雜居相處，不可能產生「種族効忠」；三大民族人口的絕大多數是利害相隸而遭受壓迫的工農大眾，不管是林連玉先生也好，賽·查哈利先生也好，雖然所屬民族有不同，却遭受相同的命運；更由於各民族成員數量約略相等，根本不可能有一民族吞併另一民族的現實條件存在。所有這些，說明了誰想在馬來亞明目張胆玩弄種族政治，一定只有悲劇下場。

明目張胆的玩弄種族政治雖然不可能，可是偷偷摸摸，若隱若現的玩弄種族政治，却是所在多有，別的不談，就是以前高舉非種族主義政黨的行動黨，現在也站在玩弄種族主義政治的邊緣。君不見當右派高唱「華人太多」，「快樂的大馬來西亞」才能使巫族超越華族等種族論調時，行動黨却說：在原則上贊成；華人必須向長堤對方的巫族表明，他們是忠於馬來亞。其實，要華人向馬來亞同胞表明忠於馬來亞是可以的；可是要華人表明忠於巫族上層的種族論調，可不容易呀！

是什麼原因使非種族主義政黨，却玩起種族主義的政治呢？理由很簡單，在殖民統治下的政黨若不反殖，教他們怎樣維持政治生命呢？無他，唯有玩弄種族政治方可苟延氣息。因為在多元民族的馬來亞社會里，既存在着猜疑、恐懼的情緒，若能挑撥民族不和或磨擦，至少可以混亂各民族人民反殖的鬥爭步驟；由於這樣，玩弄種族政治的行為，只能是替殖民主義服務的本質便够明顯了。

所謂大漢沙文主義

聯合邦的右派玩弄種族政治，缺少理論指導，所以他們的行動與言論，粗野又欠根據，新加坡的一些玩弄種族政治的人士，手段可就高明得多，甚至有的還抬出堂堂皇皇的「社會主義」理論。名堂越高，其所能產生的壞影响也就越大，

玩弄種族政治的最得意創作，應該是「新加坡華人大漢沙文主義」的發明；當然有些人是無意中患上錯覺，以為「大漢沙文主義」是華人的惡劣作風，應該改正；這樣他的立論雖欠妥當，其用心還算無可非議。偏偏却有堂堂政黨，居然提出「大漢沙文主義」的指責，不僅在文化場地上罵人，也在政治場地上叫陣，多麼荒謬！

近兩三年來；什麼像「中國的前哨」，「阿拉伯世界中的以色列」和「大漢沙文主義」的嘶叫，時時可聞，使人聽了，不禁心驚肉跳。其實，新加坡華人真的就發展了一股大漢沙文主義的逆流嗎？並不見得！請提出「大漢沙文主義」者研究一下，到底「大漢沙文主義」是什麼吧？

「大漢沙文主義」只能發生於中國，却不能發生於馬來亞，因為中國的最大民族即漢族的舊統治者，向來本着大民族的代言人的地位，看輕其他少數民族，壓迫少數民族，其他少數民族的上層領導者，有時也掛起種族主義的黑旗，殘殺漢人，這樣就產生了中國歷史數千年的民族流血事件。因此根據新聞報導：現在的中國便反對「大漢沙文主義」及「狹隘地方主義」，這其中，尤其反對「大漢沙文主義」，以免其他少數民族有「各民族當家」，「漢族作主」的錯覺。這些報導，當然不會是沒有原因的，因此，一些存心玩弄種族政治的大人們，便硬搬硬套，把中國反對「大漢沙文主義」的口號，硬拿來對付新加坡的華人。

誰都知道：「大漢沙文主義」的「大漢」，指的是中國的「漢族」，中國的漢族和新加坡華人，在文化上確實有共同的淵源，却是分屬於不同社會生活的兩個不同民族。中國的漢族不等於馬來亞的華族，馬來亞的華族更不是漢族的一組成部分，這樣說並不是要玩弄語言花槍，而是對待不同民族應採取正確的態度，不容混亂。

馬來亞華族和巫族、印族一樣，都是外來民族統治下的受壓迫民族，馬來亞人民的反殖鬥爭，實際上便是各民族人民擺脫外族統治的民族獨立運動，只要馬來亞人民堅持反殖鬥爭，「沙文主義」的情緒便不可能在各民族間發展開來，恰恰和那些高喊反對「大漢沙文主義」的論調相反，如果遠離了反殖路線，正好給「沙文主義」打開方便之門。因為在反殖鬥爭的現實教育下，三大民族人民都瞭解，大家都

是被壓迫者，知道受壓迫者的苦痛，知道各被壓迫民族勞動人民團結，友愛的可貴，也知道「沙文主義」是殖民主義者的思想的一部分，真是害人不淺。

「沙文主義」是一種盲目排外的「狹隘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抱有「沙文主義」思想的人，目空一切，正如拿破崙的將士「沙文」那樣，驕傲自大，以為自己民族的什麼都好，其他民族的都壞。自己的民族有權利統治一切，其他民族只好受其統治與同化。

由上可見，「沙文主義」是統治者的思想。馬來亞華族是被壓迫民族。她的廣大人民羣衆是比受了拿破崙鐵蹄的壓迫，又受了民主思想洗禮的民族運動初起的歐洲人民更進一步，主張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獨立自決了；因此，她不可能發展而且也反對「沙文主義」的統治階層的思想，却能激起「民族主義」的思潮。

新加坡的華人問題

馬來亞華人不可能發展「沙文主義」的思想，只能展開「民族主義」的思潮；不管在爭取國家獨立與統一的反殖鬥爭中，還是在文化事業上的愛國主義號召下，都在在証明了華族人民的「民族主義」的光榮本色，我們不只為自己民族的光榮而高興，我們也為其他民族如巫族、印族同胞的「民族主義」精神而歡呼！

馬來亞華人的特點同樣是新加坡華人的特點；可是，行動黨人却說：

「行動黨的領袖們是很容易挑起了華人們的種族感情而獲得他們的支持的，……新加坡人口中華人佔八十巴仙……如果號召爭取一個和聯合邦分開而獨立的新加坡是不難獲得華族支持的……但是大家清楚，行動黨領袖們都拒絕採用這些種族策略。」（見第八期巫文行動報）

從這一段文章中，給人的印象是：華人是「種族」而不是「民族」；只要以華人利益的口號為號召的政黨，必然勝利，不過，行動黨寧可失敗，也不情願玩弄「種族政策」。其實，行動黨錯了，恰恰相反，新馬的華人已不是「種族」而是「民族」，且在反殖運動中証明了華族是「自覺的民族」；新加坡的華人一路來都反對「種族策略」，過去的一些右派就是因為不能擺脫種族感情而在政治上大大失利，行動黨的議員（包括巫族、印族的）都因曾以「非種族」義旗相號召，才得到華人的支持。假如行動黨

的領導人真的以為「很容易挑起華人們的種族感情而獲得支持」，那末，就請他們試試看，請他們舉起「種族策略」的黑旗吧！看華人會支持他們嗎？過去右派「失敗的簿子上」正等着玩弄種族策略者去「簽到」呢。

過去的殖民統治者為了替他們的統治找藉口，他們胡說華人要把馬來亞變成中國的「第十八省」，要把新加坡變成「中國的前哨站」；以為這樣便能有理由統治馬來亞，由「英國」來「保護」馬來亞，才能避免「中國」的侵略。這種謬論是不值一駁的。

現在的行動黨却說殖民統治一旦解除，新加坡華人將發展「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東南亞各國的人民將撲過來侵食它，因此華人將很糟糕就是了。真是好笑，殖民主義倒在保護新加坡華人的安全了，有了它，倒能教育或制止華人不至於發展「大漢沙文主義」了，這樣殖民主義的功用可真大了，人民還反殖民主義做什麼呢？我們要問：這種言論除了對殖民統治有利，對人民可有利嗎？

那些認為造成「合併」困難的根源是華人及其左翼分子太多的說法，根本上是種族的偏見；而那些硬創造出新加坡的「大漢沙文主義」理論以迎合種族偏見的，說穿了也並不怎麼高明。

玩弄種族政治要不得

為什麼要反「大漢沙文主義」呢？根據行動黨的意見：「大漢沙文主義」更糟的是「任何教授馬來話以使其成為馬來亞國語的試圖都受到抗拒」。語言不能統一，則「文化統一的問題」便不能處在「順利解決的道路上」，那末，那些「將決定將來馬來亞的模型和特徵的重要課題」跟着不能解決，因此，各民族間的「恐懼和猜疑就不會消失」。於是乎，要嘛，就建立一個「一種語言、一種民族」的統一國家，否則，馬來亞前途不堪設想，馬來亞歷史的「模型」和「特徵」便不能預先創造，各民族將流血與殘殺，多可怕的局面呢！

我們既然知道：華族人民根本就不可能發展「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這里，華族人民熱烈擁護巫語為國語，也是証明之一，華族排斥巫語根本就不存在。正好相反，問題倒存在於那些抱着「統一語言、統一民族、進而統一國家」的歪論上，這種歪論實際上就是「沙文主義」的民族壓迫論的呼聲。

不錯，一世紀前，當民族自決運動開展時，依一些民族主義者的理想，固然是要「每個民族都有一

個國家」，而「每個國家都只有一個民族」，但是，這種理想是難於實現的，在歷史上，一個民族常分別在數個國家中，而一個國家中又包括了許多民族，世界上多民族國家却佔多數，極少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因此，民族自決運動發展至今，擺脫了外國統治的新興國的民族主義者進而主張一個國家的各民族擁有平等權利，來達致國家的和平，富強和統一了，甚至對國家內的民族、部族等少數人類共同體，雖然還沒有發展為現代民族，但在政治上，還是把那些少數的人類共同體當民族來看待，給予他們政治上的自治自權。

現在，只有那些民族上層份子，他們本着「沙文主義」的思想意識，自以為是本民族的「當然領袖」，他們才提出「統一語言；統一民族，才能統一國家」的過時的歪論。因為這樣才能給他們進行的民族壓迫的卑劣手法提供理論根據，玩弄種族政治的功用就在此。

可以肯定：企圖通過民族壓迫的政策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是違反歷史發展的主觀圖謀，絕不能實現的。在我國玩弄種族政治者，只能在殖民者的導演下登台。

因為馬來亞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結果，竟逼使外來者不得不改變統治形式，通過政權移交的方法來拉攏一些新政客、官僚及封建地主，企圖緩和民族主義的浪潮對統治者的沖擊，而這些被培植的勢力，一手要錢，一手要權，為了當主子之走卒，便高談什麼殖民主義勢力已經撤退，現在是「統一語言、統一民族」的時候了；而一些「非種族」的社會主義者，為了政治前途，為了和右派「求同存異」，便加入這一種族主義論調的合唱；唱出了統一民族的「重要」，更唱出了「建立民族是社會主義產前的陣痛」，最後竟得出結論：新加坡華人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妨碍合併統一，故此，非反不可；至於殖民主義呢？讓它的勢力自動消滅吧！所以說：打着反對「大漢沙文主義」的旗幟，幹着替殖民主義勢力掩護及討好右派的醜事，是新加坡玩弄種族政治者的圖謀。

自取滅亡

我們相信：那些民族上層份子，只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培植起來的殖民地殘餘勢力，它們將和殖民主義一樣，在民族運動的高度發展中，最後自取滅亡；而玩弄種族政治的卑劣手法，同樣會在人民反殖鬥爭的高漲情勢下，暴露其為殖民主義服務的本質，終歸失敗！

透視大馬來西亞計劃

威 甯

在一個外國通訊記者午餐會上，東姑突然提出了大馬來西亞計劃。使五邦政海掀起了一陣微波，各邦政壇領袖們分頭接觸、發表意見，召集議會等……交換着有關問題的意見，一時有點反應熱烈，領袖們「忙得很」的感覺。

的確，大馬來西亞計劃是一部「政治家」想將它推進為當前五邦政治中心問題之一，減少五邦人民反殖的注意力。所以，他們不留餘力，各盡所能，積極推動這已不是新鮮的計劃。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早在許多年前，菲律賓總統奎松曾經倡導包括緬甸、泰國、安南、馬來亞、印尼和菲律賓聯成的「馬來西亞聯邦」。當時除了泰國是政治獨立的國家外，其他都還是殖民地。又在一九四九年，菲律賓總統奎里諾建議成立「亞洲與太平洋聯盟」，且在一九五〇年在碧瑤召開七國會議，結果大計劃宣告流產。世界大戰結束初期，印尼和馬來亞進步的民族主義領袖在獨立鬥爭中，也曾提出類似的計劃，由於這計劃具有進步意義，終被人為所破壞了。所以，宛如大馬來西亞之類的計劃，已經不止一次被提出過。然而，菲、馬、泰三國倡組了東南亞經濟文化同盟後，東姑旋又在本年五月建議成立「大馬來西亞」，仍然引起多方面的關注。這是為什麼呢？從時代背景來看，因為這計劃與過去的絕不可同日而語，等量齊觀。莫怪人們對東姑倡議的大馬來西亞的一連串疑慮，諸如，計劃的策劃人，計劃的動機，計劃推行的後果等都先後被提出。而由於東姑說：「我有着一個把馬來亞、新加坡、北婆、砂勞越、汶萊包括在這一東南亞集團中的想法。馬來亞終得要英國與四區人民達到諒解。……目前要說出怎樣才能達到密切的諒解，未免為時過早。」總使人感到這種「想法」是籠統，可看而不可摸的。可是，五邦中有些人則不管它的含糊不清，隨意地認定它是一項「佳良計劃」加以原則支持。這種置人民意見和利益不顧，輕率從事的態度，是大家所不能容忍的。

二

問題的提出與時宜是有密切關係的。因此，環顧大馬來西亞計劃在不遲不早的本年五月間提出，可以做為我們認識問題的開始。

新加坡憲制上規定一九六三年是重新檢討新憲制的實施。所以，一九六三年對本邦來說是一個憲制鬥爭的重要年頭。從自治憲制實施二年來的經驗總結，使人民更清楚

地認識到自治權力的局限。人民始終感到自由民主依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生活並沒隨自治而得到應有的改善。總之，自治應享有的權力，今天並沒有真正獲取，認識了這一層和了解了本邦的反殖力量。於是，在一九六三年爭取完全內部自治，繼續積極反殖運動的明確目標便被肯定下來了。「大合併」計劃就正當是本邦人民廣泛，深入推展殖民運動的時候提出的。在另一方面，隨着國際民族獨立運動的不斷發展，北婆三邦人民正掀起熱火朝天的反殖運動高潮，這運動從學生界、職工界推廣到農民（農協的籌備成立）都標誌了三邦人民反殖情緒的空前高漲。這股宏大的反殖力量，深深引起了殖民主義者的恐懼！誠如砂勞越報界對大馬來亞計劃提出的歷史條件所指出的，今天「國際反殖民主義的洪流洶湧澎湃，殖民主義已為世人所深惡痛絕，星加坡人民乘勝餘威，再接再厲地爭取更大自治權；英屬北婆三邦人民正在有組織或將有組織的領導下，引吭高歌，滿懷信心地直奔自治獨立！在這種情況面前，任何一個頑固不化的人都會知道要再過殖民主義的美夢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除非另改面目來蒙蔽人民。」（註一）由於大合併計劃的提出，恰好處是在這個時機，怎不令人懷疑策劃者是負有轉移或蒙蔽人民的鬥爭視線的用意呢？因為，從長遠來看，「大合併」，可以作為「當英國抵擋不住迅速成長的反殖力量，而被迫放手對五邦的公開直接控制時，這個計劃就能使英國人在策略上安全地撤退，而且又能繼續其對此區域的經濟控制；倘若大合併僥倖地在五邦實現，就能達到中止五邦人民的反殖運動，而使五邦人民聚精會神於領土的合併問題上。於是，現實所存在於五邦的政治發展不平衡，各邦所具有的特點（差異）便會被「巧妙」地利用為牽制反殖運動。不是嗎？現在的星加坡「左翼太多」、「華人太多」……不正被利用為阻撓國土的統一的武器嗎？而且，我們相信潛伏於內部的微小矛盾，也會不合時宜被提出加以誇大和歪曲的。總之，一切有利於殖民主義者的論調必會高唱；而一切有利於反殖的鬥爭形式及行動，將會被千方百計地阻撓或削弱到最輕微的程度而後已。

讓我們舉出一些倡議人的言論來說明計劃推行的結果是會牽制反殖運動。東姑訪問北婆三邦時說：「（一）加入大馬來西亞是好的，因為（二）北婆三邦的獨立條件如何困難，地小人稀，缺乏人材，實無獨立之必要，而且三邦也無須先

行加強聯系，即可加入大馬來西亞聯邦。」（註二）作為提示三邦人民無須反殖，只須加入大計劃就可以加速北婆及星洲的獨立。可是具體的步驟如何則隻字不提了。這不教星、馬、婆五邦人民憂心戚戚，因為我們冷靜地細細分析「大合併」提議後的言論，無論如何都看不出自從計劃倡導以來，可曾提出任何有助於反殖的言論和辦法。相反地，只聽到「北婆實無獨立必要……」等等對反殖運動潑冷水的話。

回憶去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殖民地國家獨立宣言的第三條明文規定：「任何殖民地政府，不得以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的落後作為拖延獨立的藉口。」可是，馬來亞是簽名支持殖民地獨立宣言的。曾幾何時，竟然被遺忘殆盡，而說出與這條文的精神實質相違背的言論來，可以不為人所震驚乎？

自大馬來西亞計劃被倡議以還，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有關的言論，也只可以將它分為贊成與保留態度兩種，既使是用最大倍數的放大鏡來分析前者的理由，是否足以證明「大合併」可以得到良好的結果，果真能加強反殖力量，加速獲得自治獨立。然而，我們失望，除了一部分是自相矛盾外，歸納起來僅有阻撓反殖運動的企圖而已。因此，我們不可避免地獲得第一個結論：目前，殖民主義勢力依然在不同程度穩固地存在着，而且在各邦政局發展有很大差異的情況下，若依然頑固地推行「大合併」，只有增加五邦人民間的相互猜疑的心理，和內部矛盾的被擴大和加以利用，從而牽制或轉移五邦人民的反殖鬥爭，這是對人民不利的。

三

印尼外長蘇班德里奧說過，東南亞各國關係的不正常，締結盟約是無益的。這已簡單扼要地說出了自英美為首的巴格達公約及英美法為主的東南亞公約機構的侵略性軍事結盟以後，造成東南亞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不正常狀態的現在，若有非結盟成員的國家企圖與這兩個軍事盟國如：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結成盟約國，最終必被捲入軍事盟約內，而增加東南亞的緊張局勢無疑。

由於伊拉克的政變，而宣佈退出巴格達公約後，引起該軍事條約的危機而終失效。此後，由於巴格達公約與東南亞公約機構的主腦（英美法）和軍事侵略性質的一致性，所以巴格達公約的任務是由東南亞公約機構替代了，從此東南亞公約機構所負的侵略、顛覆的任務更

重大了。於是，約條上除了指明在各個成員及進行軍事活動，訓練軍隊，設立基地，展開演習……之外，也假藉經濟文化活動如技術援助方面，設立工程學院；文化方面，設立獎學金及六位教授與十位巡迴講學職位從事活動，完成特別任務，以達到立約的目的。

雖然東南亞公約曾假借各種名堂進行積極活動，可是紙難包火，原形畢露，東南亞公約機構的陰謀逐漸為覺醒的東南亞人民所識破和抗拒，馬來亞人民強烈拒絕加入和新近泰國政變後宣布中立，表明不再受該機構的束縛，不正是鐵一般地証明了。

東南亞公約機構前任官員，現任菲律賓東方大學副校長巴錫斯撰文引証下列理由：「（一）東南亞公約機構不能吸引本區中最重要的國家：印度、印尼加入陣營。（二）在泰國兩次危機中，東南亞公約機構始終處於「受麻痺無法行動」的狀態。（三）自美國壟斷核子武器之局面被打破，美國傾力反攻之論調行不通之後，東南亞公約機構已為歷史所遺棄。」來說明八國軍事聯盟的遭遇全面失敗。且指出「除非東南亞公約機構能自行調整，俾能面對東南亞國際生活之新現實，否則其今後之功用只能像蟲垂一般」（註三）所流露內心哀歎的真情，和過去所說：「自東南亞公約成立以後即沒有一個國家由於共產黨顛覆和侵略而落入共產黨手中」（註四）的得意神態相比較，大有昨天一條龍，今日一條蟲之慨。從而，我們不難得到二點實事：（一）、今天在東南亞民族運動的空前高漲結果，使各國人民決心要求獨立、自主與和平，而不願參加軍事結盟，使東南亞公約機構沒有餘地發展。同時不管願意或不願意都得承認民族運動，是時代洪流，順者昌，逆者已，致使東南亞公約的根基動搖了。這是該機構主腦先生們所認識到但又無法迴避的，所以他們驚惶失措，狂叫「東南亞事件的演變威脅世界和平」。（二）由於東南亞公約基礎的動搖，使軍事的決策人抉擇了加強軍事演習，進行鎮壓，努力在能力所及的各國加緊增設基地或採用多樣化的變相軍事結盟。以挽救東南亞公約的土崩瓦解的厄運。由於這樣，東南亞經濟文化同盟的締結和大馬來西亞計劃的制定結合看起，是否就是巴錫斯所謂調整嗎？是有理由提出這樣質疑的。

東南亞同盟是由東南亞公約的二個成員國——菲律賓、泰國及馬來亞組成。儘管它否認該同盟的目的是反對任何國家及集團，但是，

直接參與東南亞公約機構的菲、泰和英馬聯防條約簽署國的馬來亞看來，又那一個國家能超然於軍事條約外，而脫離西方的軍事集團？固然該同盟是標榜促進經濟與文化的密切合作，發展工農業與改善交通通訊和擴展貿易。可是，東南亞公約中除軍事部分外，又何況不是標榜着同樣的事項呢。東南亞同盟除軍事部分沒有明確制定外，其他各個事項與東南亞公約都「不謀而合」了，所以，含有二（菲、泰）比一的東南亞公約機構素質的國家，來推行這東南亞同盟，結果，會是促進東南亞公約的目標嗎？人們的疑雲是不易打消的。也許印尼、緬甸就有這種顧慮而拒絕加入吧。伴隨着東南亞同盟的變成，就提出大馬來西亞計劃，都該是「巧合成雙」。過去，星馬婆五邦都是英國的軍事基地所在處，一路來就與西方軍事集團保持着不可分割的關係。「英陸軍作戰部長約翰布洛天廳，在訪問打毛馬軍事訓練區時認為這個訓練地區有很大原野，可供訓練之用，而這是馬來亞所沒有的。」又說「到過毛馬的人都知道他們所做的設施，是很長久的也是為着將來而用的。」（註五）這位部長先生不正告訴我們，英國是有計劃地利用馬婆之優越地理條件做為訓練軍隊，和從事軍事活動，準備長久佔有它。加上北婆三邦原是東南亞公約的軍事演習所。所以，東南亞同盟和大馬來西亞二組織結合觀之，不正正是表面上沒有，但實質上却捲入東南亞公約機構集團中。從而擴大了東南亞公約機構軍事活動的領域，挽救這背歷史而走向崩潰中的東南亞公約機構的厄運。

四

在印尼史上，滿者伯夷（Majapahit）曾建立一個疆域包括現在的印尼領土，北婆三邦和幾乎整個馬來半島的國家。這版圖一直維持到1478年，滿者伯夷滅亡止。以後，就是印尼的印度化的結束而逐漸步入一個新殖民時代的局面。北婆三邦才自印尼被分割出來。

不久前，印尼當局依據歷史，曾申明北婆三邦是屬其領土，過後，馬上引起三邦殖民宗主國的深深關注，以後，印尼雖然一致表示沉默，可是，殖民主義者並沒有因而減少這方面的戒心。相反地却時時計謀制人法實，藉以保全在當地的利益。北婆沙白英文時報撰文：「印尼移民進入本州應加以管制，該是當前的不二途徑。因為印尼對本州的土地，時存野心，英國防部長承認，如果印尼在西新畿內亞得到

（轉入第十一版）

試論國家的聯合問題

★平民★

近來，合併，大合併問題的討論，既熱烈又廣泛，在討論的過程中，自然的要牽涉到國家的聯合問題。現在，讓我們來看看：

國家是什麼？

國家並不是在原始時代就形成的，它是在人類社會演變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的。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人們在勞動過程中，在經濟地位上，內部分裂為掌握生產手段的統治階級，以及勞力生產者的被壓迫階級對立後，前者為了有效的壓迫後者，便採取了「國家」這個從社會中生長出來，而似乎超然於社會的權力機構作為工具。

國家發生的最初原因，可能是在於抑制階級間的衝突，但是，國家既然是階級矛盾衝突不可調和的產物，因此，它通常總是被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所支配，這個階級便從經濟的優越地位上建立起政治上的統治地位，憑藉着國家這機構，獲得了壓制敵對階級的新手段。比如，殖民地型的國家，即是殖民統治者及其爪牙作為奴役人民的權力機關。

國家既然作為經濟壓迫的暴力機關而存在，因此，軍隊，警察，監牢和法庭等等，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目的便極為明顯了，就如，在殖民地國家中，國家權力的發揮者——政府，不是時時在強調國家的安全與秩序嗎？其實，執政者自以為他們是人民的「主子」，他們維護的並不是國家人民的安全，而是殖民主義的安全發展；他們又時時強調什麼警察、軍隊等武裝部隊必須絕對脫離政治，表面上看來，好像要使武裝部隊維持政治上的中立；可是，說穿了，還不是要使警察與軍隊遠離人民，脫離民族運動，好讓殖民統治者隨意使用去鎮壓人民。執政者也常常鼓吹「効忠」國家的理論；實際上，他們要求的是被壓迫者向統治者的奴才式的効忠，如果誰敢有異議，重則逮捕，輕則剝奪公民權，實行政治壓害。所有這些，說明了殖民地國家的本質！

國家隨着階級壓迫而來，階級壓迫的條件若發生變化，

國家的形態當

然隨之變化

有時，兩不同政治社會的統治階級，為謀求鞏固政權，在國際事務上有較大的發言權，擴大經濟剝削地盤甚至或為了發展兩地的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聯繫，國家與國

家間的結合也跟着發生了，假如我們抽象的把國家的結合看成國家領土的擴大，或經濟活動範圍的加廣加深，以為結合的結果必然對各參加結合政治單位的人民有利，那是絕頂荒謬的，就如一些倡導大馬來西亞計劃的先人們所堅持的論調一樣，說什麼大馬來西亞計劃能使國家領土擴大，市場加廣，能解決失業問題等，這些論調的錯誤就在於把「擴張領土」作為「發展經濟」的殖民主義的變相理論拿來強調；完全把改革生產關係以促進生產力發展才能解決失業問題的事實抹煞了。

其實，國家的結合問題，不應作抽象的理解，以為「結合」就是好的；「分裂」當然壞了。我們應該現實的分析：誰在安排國家的結合？誰又在結合的問題上有最後決定權？「結合」或「分裂」都是手段，問題在於這一「分合」究竟服從於誰的利益？

就以新馬的分裂來看，過去殖民統治者，將新加坡從馬來亞分裂開來，利用新加坡的特殊地位，方便壓制兩地的民族運動，也方便在經濟上、軍事上來控制聯合邦，而右派也為了享有蘇丹的名譽上的統治權及名譽上的政權，先後在一九四八年及一九五七年兩次背叛人民，參加分裂兩地的行舉，因此，分裂新馬這一反動的政治行動，就由殖民統治者主持下及右派的陪伴下，服從於他們的利益而付諸實現。從此，爭取國家的統一，就和爭取和平，獨立與民主一樣，成為我國人民反殖運動的一個主要組成部份。

階級壓迫的條件起了變化，國家的形式隨之而變，國家的「分」「合」也是變化的一種，國家的結合，雖然通常是由統治階級所主持、策謀及決定，但由於歷史傳統，統治階層間的利害磨擦以及人民的干預等，因此，歷史上遂出現各種各樣

國家聯合的形式

通常國家的平等聯合：有身合、物合、邦聯、聯邦，國際行政聯合會甚至聯合國等，但其中只有身合和物合，邦聯和聯邦，和國家的結合問題較有關連，也和當前人們所討論的合併，大合併問題較多聯繫，現在，讓我們簡略介紹四種國家聯合形式的意義：

什麼是身合和物合？

身合（Personal Unions）：兩個以上的君主國家，因共戴某

一人為共通的（也可能是共同的）君主或元首，是為身合。這種只是偶然造成的事實，大抵由於兩個以上的國家的王位，因王位承繼法的關係，而偶然落入同一人之手所致。身合并非真正的國家聯合，各構成國仍保持獨立。身合的實例：如一六〇三年至一七〇七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的聯合；一八九三年荷蘭與盧森堡之聯合等就是。

合物（Real Unions）：凡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聯合，不僅共戴一個元首，并且制定共同的憲法或國際條約以處理某些共同的事物，叫做物合。物合和身合不同之點是在：構成物合的各國家係通過條約來維繫，且有共通的政府機關，但同時各構成國又保持其獨立主權，物合比較穩定，并不因共同的統治者的死亡或在位王朝的消滅而解散。

除非我們認為丹麥與冰島的關係為一種物合外，最近世界上已無物合的實例。物合為一種過渡的關係；它們通常不是演變為聯邦國或單一國，便是因分裂而歸消滅。身合與物合，只能發生於君主國之間，所以統稱為「同君關係」。

邦聯和聯邦又怎樣呢？

由邦聯（Confederations）達至聯邦（Federations）是今天世界上最大多數國家結合所依賴的形式。

邦聯是許多各自獨立的國家為促進或完成某特殊目的——尤其是為維持共同或共通的對外安全——而組成的一種國家聯合。邦聯的構成國各保留原有的主權，特別是內部治安的自主權。任何構成國，都可自由退出而解散邦聯的組織，邦聯本身也沒有阻止其構成國之叛離而強制其留在邦聯內的「憲法上的權力」！

邦聯只是政治發展中的一個過渡階段，所有已往的邦聯都因構成國的結合為聯邦國或單一國而消滅。

聯邦在對外關係上有似「物合」，可是在對內的關係上則類似邦聯。聯邦有一個中央政府，不獨在對外關係上握有完全自主權，就是在有關全體的內政上也賦有重大的統治權。因此，在聯邦中，國家組織和中央政府組織的範圍是合一的；反之，在邦聯中，有若干構成份子，即有多少國家。

除了平等的國家的聯合形式外，還有基於不平等聯合的保護，宗庸的關係。國家聯合的形式，雖然

多姿多端，然而，根據新馬的現實，則唯有

出賣式的合併才對統治者有利

為什麼說只有出賣式的合併，才對統治者有利呢？因為假如新馬通過邦聯的形式合併，則新加坡至少得擁有獨立國的地位，她不僅擁有完全的內部自主權，且在國防、外交、對外關係上也可根據與聯合邦訂立的條約所付的權力來處理，英國在新馬的軍事基地的保有權限，亦須按照兩地國會的決定而重新調整，這時，新加坡人民要擁有比完全內部自主權更多的自由民主權力，同時，新加坡又可隨意脫離邦聯的組織，自成單一獨立國。假如這種局面出現，不僅英國的權益要受到根本動搖，即聯合邦右派也要大為眼紅，因為他們將眼看着新加坡人民百多年來反殖運動所取得的果實，不但絲毫未損，尚且正在鞏固、發展；間接上也影響、鼓舞了聯合邦的人民，動搖了右派的統治地位。而這樣一來，殖民地勢力在汎馬的潛在操縱權，隨着瓦解。殖民統治者及右派，怎能甘心情願做起母雞來，生「雞蛋」（提出合併的口號）讓他人吃呢？

至於新馬若通過聯邦的形式而合併又怎樣呢？根據行動黨在安順區的競選口號：既要「合併」，又要「達到獨立」，還要「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勢力」，最後更要有一個「汎馬社會主義運動的馬來亞」，所有這些，都想在一九六三年兌現，讓我們喊三聲猛迪卡吧！祝我們的行動黨英雄們的豐功偉業早日實現吧！行動黨的要求及諾言，如果真能實現，至少就應像上一期政治學報社論所提的六點一樣：即所有外國勢力撤退，新加坡成為未來新馬來亞國的一州等，可是，糟的事情却是這樣：行動黨拒絕工會有關造成有利反殖氣氛的四要求於前，復密謀不公的和聯合邦進行政治談判於後，最近新加坡社陣提出的新馬以聯邦合併的方式，新加坡成為聯邦之一州，兩地互享公民權利等要求後，行動黨馬上反對，根據吳慶瑞博士的解說：因為社陣這一要求，聯合邦官方明明不能接受！好呀！真是一言警醒夢中人！原來處理國家大事並不是根據本身的諾言，更不管人家的要求合理與否，却專看右派的眼色而奉迎，這不是明白揭露了國家的聯合問題是服從某一撮人或某一統治階層的利益嗎？

假如真的根據一般國家聯合的常例，新馬合併組成聯邦國家。那末，新加坡的人口佔全馬的五分之一，地位上却只是聯邦的十二州之一，財政上又須資助全馬，新加坡還是吃虧一點的，但是，人民知道，只要新馬能統一，人民中的一部份吃些虧，也是甘願，君不見許多愛國人士為了國家獨立與統一而被監禁，被驅逐，甚至英勇犧牲嗎？他們從沒怨言；可是殖民統治者及右派却不同了，他們害怕新馬真正統一，他們知道，新加坡若併入聯合邦而又擁有較平等的權利，那麼，他們的歪論及反動政策就要收場。他們深知：新加坡這近全國五分之一之的臨界是左翼的，而經過一段時期，聯合邦的選票也有一大部分是左翼的，如果讓兩地合併，兩地的人民將支持左翼政府上台，這一局面的出現，直接間接都不利於殖民統治者及右派，所以，不必更多的說明，真正新馬通過邦聯或聯邦的正常方式的合併，對統治者及右派都是極端不利的，只有出賣人民利益的合併，「四不像」似的合併，才對統治者及右派有利，對人民不利。這就是今天行動黨抵死也不讓人民明瞭合併的內容，怎樣也不願人民來共同處理合併的緣故。

本來，任何被分裂國家的執政者，總爭取國家的統一；中國，印尼都在為國家的主權及領土的完整而鬥爭，可是我國的右派，却一反常態，他們從不爭取祖國的統一，甚至撇開祖國統一不談，不談也罷，怎麼連退一步新馬兩地通過正常的國家聯合的手續——邦聯或聯邦——合併也不願意，好，退一步不願意，等到新加坡人民要把內部自治權從殖民統治者手中奪回來，他們還是不願意，發牢騷，據行動報巫文版八月份的社論說：爭取完全內部自治權的愛國者會給西伊利安的土著耻笑。談得真像樣，假如我國的右派還有羞耻心，那麼，當印尼正在爭取收回西伊利安時，他們為什麼臉皮厚厚，同意殖民統治者分裂自己的國土呢？為什麼又會假好心要做中人當公親，主張印尼把西伊利安交給聯合國「托管」呢？為什麼新加坡的人民向殖民統治者爭取更多權利，既不「喪權」，又不「辱國」，他們又要反對呢？西伊利安的人民，他們聽到印尼政府收回西伊利安的呼聲是何等喜躍，他們也正在組織政黨，在政治上爭取更多權利。如果我們不是以「沙文主義」的情緒，看輕西伊利安（轉入第十二版）

論行動黨的政治路線

方小青

編者按：行動黨的興衰與本邦政治發展進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換句話說：在一定的歷史階段里，行動黨在某種程度上是反映人民的政治願望。但是，由於其上層領導堅持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致使行動黨分崩離析。本文是從行動黨各個歷史過程中，分析其在各個不同時期的右傾表現，諒有助讀者了解本邦的政治局勢。

為了節省篇幅，本文的40多個註解全被刪去，它的引文是出自：行動黨的一、四、六週年紀念特刊，建黨宣言，我們的政治立場（行動黨政策論文集），行動報（1—55期），星洲日報，南洋商報等，若讀者有需要，可自行參閱。

一、行動黨的内 關及其演變

「局勢變化得太快了」。一般人都會有這種感覺。

是的，局勢的變化的確是有點快。這像是平靜的湖面掀起了軒然大波，有點令人感到突然。但是，局勢變化得快，會有什麼不好？快一點反殖民主義，快一點得到自由，難道不好嗎？所以，今天局勢總的趨向是對人民有利的。在人民心中重新燃起反殖民主義的熾熱火燄，再度豎起反殖民主義大旗，是越快越好，越早越好。

在這短短的幾個月中，政治問題的論爭真是熱鬧。可是人民在這五光十色的爭論中，並沒有感到眼花繚亂，不知何去何從。對於這種「山雨欲來滿樓風」的政治局面也處之泰然。

政治上的兩條路線

人民對行動黨的分裂也不會感到惋惜。相反的，他們認為，在反殖民主義處於最緊要關頭，在星加坡人民的利益有可能被出賣的情形下，和行動黨在政治上劃清界線，表明立場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向人民鮮明地指示：星加坡目前政治的最低要求是：爭取完全內部自治，政治路線只有一條：堅決反殖民主義。

既然，星加坡在目前只有一個前途和一條路線，那麼在過去反殖運動中曾經擔任重要角色的人民行動黨，將被處於怎樣的地位呢？在反殖事業中，人民行動黨是不是就此消聲匿跡，在星加坡政治舞台上消失呢？在處於「四面楚歌，眾叛親離」的狀態中的行動黨，將會採取怎樣的方法來解決其目前的政治危機呢？這也許是許多人比較感到興趣的問題吧。

可是，人民行動黨將作怎樣的抉擇，這只有讓他們本身去作決定。但是，我們不妨在這里指出，不管行動黨擁有如何聰明才幹的政治家，不管行動黨將採取怎樣巧妙靈活的政治策略，但答案只有二條：一條：走人民路線，繼續堅持反殖立場，和星加坡人民「携手共進」，爭取星加坡擺脫殖民統治。這是一條新生，前途光明的路；一條：反人民路線，儘量取消反殖運動，和星加坡人民「分道揚鑣」，讓殖民地勢力仍舊盤踞在祖國的土地上，這是一條沒落，黯然無光的路。

任何人如果想利用其聰明伶俐的頭腦，巧妙地在「五股勢力」，「三股勢力」的夾縫中求生，然後右手打「英國獅子」的頭，左手捶「共產大熊」的胸，又用雙腳踢開

廣大的人民羣衆，這將是自掘墳墓，把自己葬在闕無人煙的荒漠中，即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也引不起人家的同情。

廣大的星加坡人民正在熱心地關注他們的變化。但我們相信，人民早已胸有成竹，心裏有數；誰反人民，人民反誰。

芳林補選後，行動黨的態度

早在芳林補選前，星加坡在行動黨兩年的管理下，不但不能享受到更大的民主自由權力，不能很好地改善生活條件，而且要人民取消反殖，這已經引起人民普遍不滿。尤其是那種在形式主義的外套中進行改良工作，更令人氣喪。芳林補選恰巧成為人民對行動黨情緒高低的溫度計。很不幸地，測驗結果，反行動黨情緒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行動黨以五千多票之差，敗在其對手中，政治氣候起了很大的變化。

芳林補選失敗，激起了行動黨非常大的憤怒，行動黨領導聲氣得暴跳如雷，七孔生煙，他們氣得把一口怨氣吹向芳林區選民，說「芳林區人民作了錯誤的決定」。但是，假如僅僅將這失敗的責任推在芳林區人民的身上，似乎是不合邏輯的。為什麼芳林區人民會作出錯誤的決定呢？為什麼一向來是支持人民行動黨的芳林區勞苦大眾，會投票給一個曾經在高等法院被判為說謊者的投機份子呢？行動黨認為這一定是有原因的。於是，行動黨領導層就在牡丹花身上尋找毒刺，希望從芳林失敗中，找出攻擊左翼的口實，向左翼展開攻擊和誣蔑的宣傳戰，以洗清及卸却其在芳林失敗的責任，並企圖在人民的眼中，撒下一道紗幕，使人民錯誤的以為，芳林區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行動黨領導層在政治路線上犯了很大的錯誤，而是因為在工團中的左翼冒險份子的「瘋狂行動」所造成的結果。

五一勞動節，李總理正式敲起向左翼宣戰的第一聲鑼，提出：要「求同」，就要「求」和行動黨的「同」。跟着行動黨走，就不能有「異」。假如和行動黨有「異」，行動黨是不容「存異」。好了，行動黨的態度是非常明朗；要支持行動黨，就要跟行動黨走，一句話都不能夠講，要和行動黨團結；就要聽行動黨的話，不能說聲「不」。就像古代封建王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但問題是，如果行動黨能夠正確的領導全星人民，走向真正的反殖民主義道路，爭取真正的民主自

權由利，則一些人要「死」，也瞑目。在九·一八時，多少人為爭取自由民主而犧牲；在大選時，人民為了使行動黨能執政而獻出無數精力血汗。甚至，在芳林補選中，人民為了左翼的團結，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幫助行動黨。行動黨憑什麼理由懷疑左翼沒有支持他，李總理憑什麼理由要提出「求同」就和行動黨的一切都要「同」。要「存異」就只有分裂。假如有什麼地方值得懷疑，我們倒是覺得行動黨兩年來反殖的態度值得懷疑。假如有什麼地方值得提出，我們倒要提出，只有反殖民主義，大家才有「同」。至於要不要和行動黨「同」，就要看行動黨是不是真正在反殖民主義了。

就是這篇五一獻詞，行動黨吹起了向左翼宣戰的號號。

安順補選成為政治爭 論的中心

左翼人士既然不幸地被套上「芳林失敗，你們要負責」的罪名，「無罪的羔羊」只有再發出真誠的呼聲。六月四日，六職工領袖發表聲明支持行動黨在安順補選的立場，並提出四大要求，作為爭取一九六三年憲制談判的基礎。

在這同時，行動黨上層右派領導也在黨內碰了釘子：五月七日，各支部代表在中央，區部，五十一支部的聯席會議上，紛紛提出意見，反對行動黨在此時辭職。於是中央在原則上接受不辭職的決定。可是，行動黨再強調，如果安順再不中選，則要考慮辭職。

在這時，聯邦總理東姑拉曼在東南亞通訊記者俱樂部舉行的午餐會上提出「大馬來西亞計劃」，這真是無獨有偶。東姑的計劃立刻成為安順區補選爭論的中心。行動黨也通過了李總理在邦慶紀念會上表示：「我們支持聯邦總理的聲明」。

問題就更加複雜了。安順選舉已不再是普通的競選，而是成為對星加坡前途爭論的場所。當時政治爭論之中心問題是：「大馬來西亞計劃」（由東姑提出），「星馬合併」（由行動黨提出），「爭取內部完全自治」（由六職工領袖提出）。於是，安順補選的結果就有可能被目為人民意見的一般反映。

安順補選，行動黨又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呢？大家說：「大合併不實際，合併內容不清楚故失敗」。行動黨說：「這是被人出賣，被人背後刺了一刀，故失敗」。行動黨就是為了被人出賣這個原故，「不中選，要辭職」的招牌就收回去，而改為：為了人民的利益，政

府將堅持下去。

事情的發展就是以這個問題為中心，李總理在黨內通過信件方式取得了中央委員會的信任。又在七月廿日通過了立法議會，以多一票之優勢取得了議會的信任。於是現政府就這樣繼續下去。「英國獅子」和「共產大熊」互相勾結的神話，被認為是現政府應該繼續的最可靠理由。

人民在面對着這些錯綜複雜，波詭雲譎的局面會感到迷惑嗎？不會的，事件發展的結果不是很清楚嗎？一方面是行動黨「苟延殘喘」地執政，一方面是社會主義陣線「威力萬鈞」地宣佈誕生。

目前局勢的特點

從芳林補選到安順補選，其間僅僅只有四十七天，可是，本邦局勢的發展不但變化的快，而且在反殖運動中的隊伍也「分得快」又「分得清」，這是目前局勢發展的最主要特點。

為什麼說「分得快」呢？就是說，在反殖民主義運動中，有些人不堅持反殖路線，對殖民主義者妥協，半路要「出家」。因此，在反殖民主義的統一戰綫中，有些人就退出來，就分出來。可這一「分」，就分得「快」了。芳林補選時，左翼力量尚在力求團結，要「求同存異」。但不到四十七天，安順補選後，不但不能團結，而且一定要分裂。這不是很快嗎？

為什麼說「分得清」呢？就是說，反殖民主義是當前人民的主要任務，撤消殖民地勢力，爭取自由民主權力，是人民的迫切願望。因此，不反殖的右傾份子就會在反殖民主義隊伍中礙手礙腳，產生阻礙作用。有時這些人又會在背後「放冷箭，下毒藥」，如果不和他分清「你是不反殖」「我是反殖」這種鮮明的政治路線，則會令人「敵我不分，自亂陣腳」。這是對反殖事業有害的。因此就要分「清」政治立場，分得越「清」則越好。這是所謂「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在反殖民主義運動中左翼隊伍內的一些右傾份子被分割出去是局勢主要特點。

我們怎樣描繪目前行動黨的形像呢？行動黨六週年特刊曾經很有趣地說過這段話：「到了一九五四年，勞工黨的威信一落千丈，而且內部開始腐化，它陷入了一種癱瘓的狀態，清黨，開除黨籍，以及辭職之事連續發生」。假如我們拿一九五四年的勞工黨來比喻行動黨是不大適當，但是假如以「四面楚歌，眾叛親離」來形容行動黨目前的

處境，該不會過份誇張吧！

素來自稱以組織最龐大，紀律最嚴密的行動黨，今天也會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堪回首往事。想當年，以「秋風掃落葉」姿態席捲四十三席而當政的「雄風英氣」，來和目前「眾叛親離，冷冷清清」的情形比較，真是要流盡英雄淚。

行動黨內部大分裂，（這不是派系的分裂而是政治路線的分裂）而只餘下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是目前局勢另一特點。

在今天，一切的分家（跟行動黨決裂）合夥（社陣成立）都是為了更積極，更有效地反殖民主義，故這局勢標誌着反殖民主義運動經已進入另一階段。由消極地反殖進入到積極地反殖民主義。

二、論行動黨的政治路線

行動黨成立的意義

看到行動黨的今天，再來回憶一下行動黨的成立是很有意義的，自從一九四八年六月廿日，殖民統治者為了鎮壓反殖運動，為了肅清進步力量，頒佈了臭名昭彰的「緊急法令」，於是，一切進步團體、人士，不是被解散，就是被關在監牢中。正如行動黨六週年特刊中「公開的革命」所形容的：『……因為幾乎所有左翼政黨都已經遭受不幸的夭折。除開馬來亞共產黨之外，「緊急狀態」前期所有左翼組織，例如馬來青年愛國黨，馬來亞民主同盟，馬來亞國民黨以及馬來覺醒青年團都遭受到英國的強力消滅，抑或鑒于在緊急狀態下，不能活動而自動解散。』

這時候，反殖民主義運動陷於低沉平靜的狀態中，人民則在白色恐怖，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人類的根本人權的情況下生活着。

可是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浪潮是永遠不會平息的，它正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永往直前，反殖運動的浪潮正在甦醒。

「五一三」事件的爆發，是反殖運動的一個轉捩點，當時，華校中學生為了爭取學生免役，提出了「愛和平，反戰爭」，「要讀書，不當兵」的口號，這項運動揭穿了殖民主義者的「亞洲人打亞洲人」的陰謀，喚醒了人民對殖民主義者的痛恨。「五一三」事件正像春風一陣，吹生了燒不盡的野草。洶湧澎湃，波瀾壯闊的反殖運動又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工人羣衆展開了一系列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的鬥爭，農民也在為改善農村的落後，提高農民的生活程度展開鬥爭。（轉入第八版）

（接自第七版）

這時候，各種自發性的運動，假如沒有一個團結的中心，來作為羣衆運動的主導，將會羣龍無首。尤其是在政治上，更需要一個代表人民意志的政黨，作為憲制鬥爭的工具，所以，行動黨應運而生。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行動黨打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其黨的性質就決定了它的領導層，必須依靠羣衆的力量，代表人民的意志來作政治路線的根據，也就是說，行動黨的成立是建立在全民反殖運動的基礎上，是建立在全民需要一個代表他們意志的政治機構，作為憲制鬥爭的工具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的說，行動黨的成立是當時反殖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所以，行動黨在初期，曾經領導人民在反殖運動上，放射出光輝燦爛的光芒，照耀着人民走向反殖的道路。假如有些人要漠視這種鐵般的歷史事實，而沈醉於往日行動黨的光榮成就的幻想中。或者，天真地解釋為，行動黨的成立應該歸功於幾個聰明人，用其巧妙靈活的政治策略的結果。那麼我們在此奉勸這些人清醒一點吧！認清事實。要不然，終有一天要被人民唾棄，而那聰明的，巧妙的，靈活的政治策略轉動不靈的時候，將會陷入於無底的痛苦深淵，無以自拔，則悔恨已晚。

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

既然行動黨具有那麼光輝燦爛的歷史記錄，為什麼到今天却陷於「四分五裂，土崩瓦解」呢？為什麼以前人民熱烈支持它，現在却紛紛要離開它？為什麼以前曾經和它在一起奮鬥「打天下，定江山」的黨內人士，到現在却要跟它劃清政治界線，勞燕分飛呢？為什麼行動黨的政治路線離人民越來越遠？是什麼因素使行動黨的政治路線走樣呢？問題都在這裏。

其實，作為一個關心政治發展的人，是有必要非常細心地來檢討一下一路來行動黨的政治路線，才能够徹底地了解目前局勢的發展，了解其政治路線的真正實質，則上面那些問題當然就迎刃而解了。

什麼是行動黨的政治路線呢？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是行動黨成立以來沿用的政治路線。但是，在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為了更清楚地說明起見，我們不妨把行動黨從建黨一直到現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分為三個階段來評述。

第一階段：反殖中（九一八前）的機會主義路線。

第二階段：右傾路線的理論準備（九一八後，八二二前）。

第三階段：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踐。（八二二以後到現在）

第一階段

1954.11.4—1956.9.18

反殖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行動黨從成立開始，基本上就具有了右傾機會的傾向。但在這時

期中，反殖運動的浪潮高漲，反殖成為政治中心。因此，行動黨在這時主要活動也突出地表現出反殖的姿態。

反殖中的重要問題

在當時反殖運動中，行動黨提出了幾個中心的政治問題，作為反殖的具體內容：

A 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主義的馬來亞。

這是行動黨秘書長李光耀先生在「我們的立場」題中的話：「我們主張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主義的馬來亞……我們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獨立。」

B 廢除林德憲制

在林德憲制下，整個政府都控制在殖民地官員手中，政務部，財政部及律政部的三大要職皆操縱於殖民地官員的手中而總督又有否決權。因此，行動黨在1955年1月30日在維多利亞紀念堂召開一次羣衆大會，揭露林德憲制的虛偽，一致抗議林德憲制的不民主。

C 取消緊急法令

行動黨特刊中「我們的宗旨」有一段話：「因此，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要求取消緊急法令」，我們認為只有這一法令取消後，人民才能有更多的自由去從事於社會及政治活動。」

在1955年6月26日，行動黨的常年大會中有一條議決案：「聯合各政黨為取消緊急法令而共同努力。」

在研討林德憲制的羣衆大會也有一條決議：「本大會議決：現存於緊急法令中嚴禁言論，表達，集會，結社等自由條例應予撤消以保證人民通過合法方式達致民主進步。」

同時，「廢除禁止言論、集會自由的緊急法令」也成為行動黨的競選綱領中的一項原則。

D 反對英國基地

在行動黨常年會員大會有一條議案：「強硬抗議馬來亞變為東南亞軍事基地；呼籲澳洲人民制止孟齊斯政府派遣軍隊來馬。」

在另一羣衆大會也有一條議案：「林德憲制承認英帝國的武裝部隊在星洲的額外的地方方法權，此乃嚴重地侵犯了星洲人民的主權。」

從上述幾個比較重要的、原則的政治綱要來看，我們可以肯定，當時行動黨所從事的所有政治活動，都是環繞着一個中心問題：反殖民主義。所以行動黨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全星人民的意志，是領導人民反殖民主義。所以，這時期，行動黨是走反殖的政治路線。

右傾機會主義的最初表現

可是，是不是認為，既然行動黨是走反殖民路線，就應該不會走右傾機會的路綫了。問題可能這麼解釋。我們說這時期行動黨反殖，是說這政黨的主要活動內容比較突出的表現是反殖的活動。但這不能說，行動黨在這時就沒有右傾的表現。更重要的是，這時的行動黨會積極反殖也是二項因素促成的。第一，當時全星人民反殖情緒高漲，行動黨不領導人民反殖，將沒有前途，尤其在初成立時期，行動黨必須吸收和發展廣大的羣衆基礎。所以時勢迫使行動黨要反殖。第二，當時行動黨的基層甚至中央有許多都是從「人民中來」的領袖，代表着一定的人民意志，而這些人對當時行動黨的政治路線是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行動黨才會走反殖路線。

我們說：當時行動黨有右傾機會的傾向，但不是主要表現是有理由的。因為不走反殖路線，行動黨沒有路可走。但面對着英國龐大的軍事力量，行動黨又有點動搖了。當人民起來堅決地反殖民主義，要用行動來表示反殖時，它就被羣衆嚇壞了。於是，這些反殖行動，往往就被無情地套上「不合憲制鬥爭」，「暴力行為」，「左傾冒險份子的陰謀」的罪名。這無疑是在替殖民主義者製造逮捕，掃蕩的口實，在殖民主義者面前指着「這是暴力行為者」，「左傾冒險份子」。這十足表現出他們的投機性質。這就是說在局勢對他們有利的時候，他們會高呼反殖民主義。當局勢的發展對他們不利的時候，或者殖民統治者發怒的時候，他們便嚇得面無人色，臉青唇白，於是便退却，便逃跑。

其實，在1955年，「幾股勢力論」早就出現，讓我們看李光耀先生在「我們的立場」所說的「在這個地方上出現了三股強大的勢力：英國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和馬來亞民族主義」。認真研究起來，「幾股勢力論」的基本特質，就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表現，因為在面對一個最大敵人的時候，全民就該團結一致，共全反殖，那里還有那種閒情逸緻來分「你是什么」，「我是什么」。假如行動黨的「幾股勢力論」只是要分清在反殖運動的不全政治路線，我們倒無可厚非，但是我們從行動黨幾年來的歷史分析起來，「幾股勢力論」的真正目的是在最困難的時候，成為他們逃跑的「後門」。

以「人民行動黨歷史經驗的分析和總結」為題的「公開的革命」中，就說出他們心中的話：「選舉後的幾個月內，黨內民主及社會主義份子清楚地認識到，他們勢必要在兩條戰綫上鬥爭。一方面，殖民地主義的力量在當地的右翼份子增援下與日俱增。另一方面則有冒險份子和極端份子。」事情就是這樣

簡單，行動黨在他們的朋友中找到了「異己份子」，他們找到了向殖民地妥協的重要論據。這種「兩條戰綫上的鬥爭」，充份地暴露了行動黨當時右傾、投機的本質。我們不了解，「冒險份子」，「極端份子」是指那些人。會不會是那些在黨內一起為反殖事業共同鬥爭的那些同志。因為我們所知道的，在當時只有反殖份子。假如對真正反殖民主義人士目為「冒險份子」，這是一個最惡毒的誣蔑和陷害。

行動黨的右傾機會主義是在「福利罷工」事件比較突出地表現出來。

福利罷工事件與行動黨

1955年「福利事件」是星加坡反殖運動中的重要環節，巴士工人在為爭取他們切身利益展開罷工行動時，却遭受到殘酷的鎮壓。但是，行動黨不但沒有譴責殖民主義者這種鎮壓手段，而反過來大罵這是「冒險份子對黨的潛在威脅」。在「公開的革命」中說：「這樣，當一九五五年五月福利工潮演變成暴亂事件時，政府和右派力量企圖嫁罪於人民行動黨。黨雖然同情罷工工友，可又向報界發表聲明，譴責『五一二』暴動，勸公眾人士遠離罷工地點。」接下來又說：「政府的失策為極端的政治冒險家（共產黨人及其他）創造了一個機會，將普遍反政府的情緒化為暴亂。」「不過，福利事件使黨的領袖領悟到冒險份子對黨的潛在威脅。他們用過激的行動企圖陷害黨，驅使它放棄憲制主義的，非暴力的立場，而慫恿冒險主義的策略。」多麼露骨的醜態啊！我們在全文中沒有看到，行動黨對於使用暴力的政府作任何的譴責。而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是「政府失策」。相反的，對那些受暴力鎮壓的無辜者，却痛罵一頓，指這是「政治冒險家」的機會。

我們在此指出行動黨在這次福利事件中的錯誤：第一，他們從表面上來看福利工潮，他們錯誤地認為，福利暴動是極端份子創造的機會，而根本否定了這是殖民地政府鎮壓反殖運動的一項行動。因此將責任推到反殖份子的身上。第二，替殖民主義者創造鎮壓的條件，拚命向殖民政府表白他們和「極端份子」不同，使殖民政府相信他們的「清白」。第三，對於採取暴力的政府，不發一言，而認為只是「失策」而已，但對反殖份子，則說「罪該萬死」。

好了，「兩條戰綫的鬥爭」就是一方面向殖民勢力諂媚，討好，一方面向反殖份子污蔑，攻擊。這還會有什麼政治策略比這更靈活呢？

這是行動黨第一次表現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是「幾股勢力論」的第一次運用。

九一八事件與行動黨

「九一八」是人民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最高潮，是殖民地政府鎮壓

人民最殘酷的時刻，同時，也是右傾機會主義表現最右傾、最妥協、最投機的時刻。

「九一八」事件爆發後，全星的反殖社團被封閉，民主人士被捕殆盡，行動黨廣大的基層受蹂躪，可是行動黨的領導層跑到那里去呢？這是誰也不知道，就是寫「行動黨歷史經驗的分析和總結」的作者，在那篇「公開的革命」文中，也巧妙地不提1956年的事，而由1955年跳到1957年，好像行動黨並沒有1956年的歷史。（讀者可參閱公開革命。）

假如人民行動黨的兩條戰綫的鬥爭是：不和殖民主義者或右派捲入反共的十字軍中，又不曾作為共產黨的工具，這當然是無可厚非。可是，從「九一八」事件看來，事情並不是這樣。而所謂兩條戰綫的鬥爭，原來就是當反殖力量空前高漲而殖民地統治者要用武力鎮壓時，在這兩股勢力面臨攤牌時刻，第三股勢力的領袖們卻從這夾縫中溜到金馬崙高原去度假。假如情形是像我們解釋的一樣，則這是星加坡歷史的不幸，就難怪「公開的革命」不提這不幸的一年——1956年了。

第二階段

1956.9.18—1957.8.22

右傾路線的理論準備

「九一八」事件過去了，反殖民主義的波浪在表面上平息了，我們的「英雄」們從天空再度降臨人間，要來拯救世人。

殖民主義者掃清了所謂「極端份子」，也減少了行動黨內「左翼冒險份子對黨潛在的威脅」。而「保持了它（行動黨）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完整和獨特性」。

雖然我們不敢相信，行動黨對於「九一八」的掃蕩，會感到幸災樂禍，但是我們却敢相信他們一定會點頭說，這是暴力政策的結果。這樣，行動黨領導層當然就可以「心安理得，態度逸然」地走出。向星加坡人民說：現在唯有我們行動黨才有可能決定星加坡的前途。正如人民行動黨機關報——行動的社論指出：「我們毫不誇大地說，在下次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的一舉一動比任何政黨都要起決定性的作用」。在同期社論中又說：「可是，五月間星加坡默迪卡談判的失敗却並沒有觸動另一次暴動，這不能不歸功於星加坡領袖的鎮靜」。是在這種「羣龍無首，局勢真空」的情況底下，對於這批「鎮靜」的領袖出來領導人民反殖，我們的確不能不將「功」歸在他們身上。

於是，行動黨喜氣洋洋地對於默迪卡談判表現了非常大的興趣，憲制談判又成為當時的政治中心了。

（轉入第九版）

（接自第八版）

行動黨對星英談判的態度

可是，行動黨對於五月間的、十月間的兩次暴動事件，是不會忘懷的。對於「九·一八」事件以後，反殖運動受挫折感到悲觀，看不見人民潛在力量，相反的，却用放大鏡看英國的軍事力量，給英國的軍力嚇壞了。行動黨第6期社論中說：「十月暴動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只要三營軍隊就足以統治星加坡」。就是因為這樣，「九·一八」以後，行動黨已經要為它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做好預備，甚至創造了許多理論作為其右傾路線的根據。

這時候，行動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主要表現在星英憲制談判的態度上。實際上，行動黨當時犯了一個非常重大的錯誤，就是在星英憲制談判的過程中，將自己對於民主，自由限制在一個極小的圈子里面，然後才在這小圈子和英國討價還價，同時同意林有福所提的憲制內容。第八期行動報社論說：「……我們不應忘記，今年三月間各政黨達成的協議，和去年的完全一樣，各政黨並不要求獨立……在一百巴仙當中，交回廿五巴仙給英國，讓它控制外交和對外防務，星加坡只得到七十五巴仙，亦即內部完全自治」。在同一社論中：「我們無意像去年的某些團員一樣搞出一些騙人的計劃，將內部自治裝成獨立。兩次代表團雖則被稱為默迪卡代表團，但默迪卡這個字眼，與其說是準確地表現代表團要爭取的任務，還不如說是代表人民的最終願望。」

既然，行動黨在當時沒有以人民的力量為後盾，不敢發動羣衆，自己的要求又是如此，當然，憲制談判只好讓英國殖民地部擺佈了。更重要是當時，英國政府也正在和聯邦談判獨立，並答應聯邦在1977年8月31日獨立，但星加坡卻沒有包括在內。我們感到很奇怪，作為一個爭取星馬統一為最終政治目標的政黨，行動黨對於星馬即將分割的現實，却漠然處之，連一聲抗議星馬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政策的措施也沒有。更糟的是，把它看成是既定的事實。

行動黨為什麼會

接受憲制談判

決定行動黨對於憲制談判向英國妥協的態度，是由於其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造成的。在分析當時行動黨處理憲制談判的問題，「公開的革命」的作者曾經很悲觀地說：「當時黨的代表正在倫敦參加新憲制談判。這個被提出來談判的憲制只允許給予星加坡內部自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這個憲制經過全面地研討之後，認為鑑於當時的政治現實，應該接受內部自治，然後進一步爭取通過跟聯邦合併

而取得星加坡的獨立。如果不這樣做，就只有反對這個新憲制，而這就意味着英國將通過本地的親殖民主義和腐敗的政治勢力，無限期地統治星加坡的內政和外交。」

我們不了解行動黨對於「當時的政治現實」的解釋是什麼，假如我們沒有解釋錯的話，那麼「當時的政治現實」就是，殖民地勢力非常強大，反殖勢力相對弱小，就這樣，行動黨悲觀地結論說：「反對這個新憲制」，就會讓殖民地無限期的統治。也就因為這樣，在憲制談判中，向英國妥協，走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就成為必然了。

假如行動黨在當時敢於發動羣衆，一方面反對星馬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方面暴露內部自治的本質。相信全星人民再付出代價，也會支持行動黨。

就是因為行動黨這種右傾妥協的態度，新憲制談判的結果，給星加坡人民帶來了一個殘缺不全的內部自治，連李光耀先生在英倫時也不得不表示這是「三須古的默迪卡」。

殘缺不全的內部自治

讓我們來看看當時憲制談判中幾件比較重要的條文，以及為什麼我們要說這是「三須古」和殘缺不全的內部自治。

首先，我們要說的是內部安全委員會對本邦的控制。

內部安全委員會不但是英國將星加坡人民圈在一個小天地的銅牆鐵壁，而且其每一根有毒的觸角，都能夠深入到星加坡人民的心臟。英國可以通過這個工具監視星加坡人民的一舉一動，甚至可以直接干涉星加坡人民的內部事務。內部治安委員會存在於星加坡憲法條文中，就意味着「自治」僅僅是形式上的東西而已。正如在酸臭的殖民地主義的外套上，披上幾條顏色鮮麗的彩條，插上幾朵枯萎的黃花一樣不倫不類，可是，行動黨對於這個有名無實的內部自治是接受了。雖然在談判的最初階段，當殖民地露骨地扛出內部治安委員會時，行動黨曾經一度反對，可是當殖民地巧妙。地將內部治安委員會的最決定性的席位讓給聯邦的時候，行動黨像發現奇蹟似地宣佈：可以接受了。在行動報第八期社論「星英憲制談判報告」中說明了這種心裏「……內部治安委員會「三三一」制組織（英星各三、聯邦一）的重要就在這裡，「三三一」制的組織，使聯邦代表在上述兩種特殊情況裏成為決定國家元首行動的人……英方這次接受，或許由於發現：新加坡的將來，最後總會由聯邦而非英國來決定。」社論再接下來是譴責那些反對內部治安委員會的人說：「如果我們一方面要和聯邦合併為獨立的馬來亞，一方面反對聯邦代表在新加坡內部治安委員會裏擁有的權力，那就是不合

邏輯，甚至是不誠實。」

從這幾段社論中，我們不難看出，行動黨作出接受憲制的決定，似乎是要向人民說：我們是希望由聯邦政府來決定我們的命運。這樣就可以掩蓋他們向殖民地妥協右傾的真正態度。

可是我們認為行動黨這樣的解釋是不誠實，甚至是虛偽的。

我們說他們不誠實，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很坦白地向人民說明，內部治安委員會是真正地控制着星加坡的內部事務，而自治的內容是虛偽的。我們說他們虛偽，是因為他們欺騙人民說，真正控制治安委員會的是聯邦政府而不是英國。其實真正控制治安委員會是英國人。誰不知道，獨立後的聯邦，英國尚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誰不知道聯邦右翼政府對星加坡左翼政府是採取敵視的態度。甚至行動報第四期的社論也公開承認這個事實：「在聯邦，當東姑在今年（1956年）正月與英倫殖民地部談判而凱旋歸來，有權管理國防，內部治安與財經以後，英殖民者已經很成功地將他們隱藏在聯盟部長們的後面。——這種情況和給聯邦在1957年8月獨立的諾言配合起來，已經分散了人們對於事實的注意，即對英國通過他們的武裝力量，通過他們的政務部長的警察與行政權而繼續控制的事實。」

我們不禁要反問行動黨，英國既然有辦法繼續控制聯邦，為什麼英國又不能在治安委員會里面影響聯邦代表的決定呢？所以提出治安委員會的決定權是在聯邦政府手上的說法，難道不是虛偽的嗎？我們要進一步問：既然是稱為內部自治，為什麼我們的內部事務要由人來干涉？難道新加坡的人民會像樂園里的豬，永遠滿足於被人擺佈的生活？

除了在治安委員會的問題上採取了妥協的態度，就是其他的重要條文也是採取相同的態度。例如，在星加坡自治政府不能控制本邦治安或英國認為有必要時，英女王可以隨時撤銷新加坡憲法等等辱國喪權的條文，以及到最後接受了「禁止政治拘留犯參加首屆大選」的條件等。都被行動黨一一接受了。

第三階段

1957.8.22——1961.9.15

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踐

如果說1956年「九一八」以後，局勢給行動黨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理論上的準備。那麼1957年「八二二」事件，行動黨黨內事件爆發，再給行動黨一個機會，使它更容易，更決心地跑右傾機會主義的道路。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執政後，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一直被徹底地執行着。在理論上，行動黨創造了只有通過星馬合併才有可能獨立的「合併至上」論，提出了

「建設國家論」，「經濟繁榮論」，而反殖民主義的理論呢？「要得到自由，不再是一個向英國鬥爭的簡單問題了」。因此，行動黨對於殖民地主義者的態度，達到了空前溫和的地步。對於反殖的人民羣衆却日益疏遠，甚至給予種種的污蔑和排斥。對於黨却加強控制，黨內民主就像黑夜里的螢光一樣淡薄。

八二二事件和行動黨

「八二二」事件是行動黨黨史中一項最醜惡的歷史，是行動黨最黑暗的歷史，黨內民主被絞殺在狐狸的微笑聲中。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八月四日，行動黨舉行第四屆黨的常年大會，並要在這天選擇出中央委員會。當時，選舉是在民主的基礎下進行的，每個黨員都有投票權，選舉權。選舉結果，十二名中央執行委員會被選出來了。

這一舉選結果，頓時使當時掌權的中央執委，感到極端驚惶和憤怒，他們不但發現了他們小集團中的少數「民主份子」被黨員唾棄而不中選，而且根據他們「親自再度細心研究共產主義的著作」及列寧和毛澤東的理論的心得以後，用紅色的眼睛看到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也居然有了「革命的鸚鵡」和「舊本教條的共產主義份子」。於是，一項近乎瘋狂的污蔑和狐狸似的葛斯底裏尖呼聲，喚醒了蹲在身旁隨時欲撲殺羔羊的惡狼。

舊的中委看到不能控制黨，左右黨，看到自己的小集團不能得勢，就狠起心來拒絕和新的中央委員會合作，在黨內分為溫和派和急進派。

雖然我們不了解舊的中央委員的真正企圖是什麼，但是我們却看不出新的中央委員會有什麼理由鬧到分裂。因為第一，選舉中央是在黨常年大會由黨員在民主的基礎下產生的，這是完全符合民主社會的選舉原則。第二，新的中央執委並沒有提出修改黨章，修改政治綱領，修改政治路線，而是沿着固有的行動黨原則走。這樣，即不是不合法奪取領導權又不是與政策有違反，舊的中委憑什麼理由要分溫和派，急進派呢？憑什麼理由不和新的中委合作呢？是不是因為自己的集團沒法控制黨而撒手不幹，還是希望由別人的手來進行清黨？

我們非常幸運地看到，一名人民行動黨的發起黨員，能够在事隔三年後，跟我們重述這段歷史，並說出他們的真正意圖：

「這是幸運的，因為它使人民行動黨能夠預想他們的行動和意圖，而採取必要的對付措施。……

人民行動黨領導們決定冒險份子應該公開黨的工作以及他們的行動。非共領袖們並不願作工具，他們宣佈他們不要就職。

這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假如八二二事件真的是，一羣革命的鸚鵡，要用共產主義的教條，來奪取行

動黨的領導權。於是行動黨就會被偽裝成為它的信徒的人所扼殺。情形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羣可憐的鸚鵡，只能怪他們多嘴，這樣，「被人所捕，被人所逐」是「理所當然，罪所應得」。

可是，歷史假如是由一個泯滅良心或故意歪曲事實，搬弄詞句來混淆後人的視聽，以洗脫其罪名的人來編寫的，那麼這篇歷史就有重新估價的必要。恰巧地，我們在「公開的革命」發現了這種情形。

八二二事件的實際情況

我們不是一個歷史的無知者，同時，「八二二」事件距離我們也只不過是三年的實事。我們不會胆小到令該文中幾個刺眼的字詞，如「冒險分子」，「共產主義」，「列寧」所嚇壞，而被紅核塞住心竅。我們也不會愚蠢到令那些動人的，漂亮的名詞，如「非共領袖」，「民主份子」，「忠誠黨員」迷亂了心扉。所以我們對這篇文章產生了許多疑問。

第一，根據「公開的革命」的記載；「八二二」事件是因為冒險分子要奪取人民行動黨。可是，根據我們知道，當時行動黨中央委員會的改選是在該黨的常年大會進行的，而且是在公開的場所（羽球館）由黨員投票。這是行動黨有史以來最民主的一次中委選舉。這怎麼能夠說是奪取呢？因為「奪取」是通過非法的，甚至暴力的形式才算是奪取。我們看不出八月四日的常年大會有什麼地方不合法，有什麼用暴力。假如這個會議有不合法，這個責任倒是應該由舊的中委會負起。因為他們召集不合法的會議讓不法分子來奪取領導權。但是他們不得不用「奪取」這個字，就不能掩蓋他們那些所謂「民主份子」被當時黨員唾棄的事實。這是他們在行動黨史上編造的第一個謊言。

第二，根據「公開的革命」的記載，冒險份子奪取行動黨的主要目的是「企圖把中國和蘇聯革命領袖對付特殊情況的策略和戰略，運用到馬來亞的環境。」可是我們知道這是一個最狠毒的污蔑。因為根據我們所知道，當時的常年大會，根本就沒有提出任何修改章程，修改政治路線的提案，也就是說，行動黨將會站著原有的政綱來執行。在大會中完全看不到「企圖用中國和蘇聯的策略和戰略。」

那麼，為什麼他們時常要用「中國」，「蘇聯」，「共產黨」的字眼來污蔑人呢？這正如人要做壞事，最好先製造一個理由，像狼要吃小羊，理由是：「我要吃你」。另一方面，可能是這些「民主份子」，長期坐在冷氣房中細心研究共產主義的著作以後，被共產主義理論搞到頭昏眼花，滿天紅彩，而走出冷氣房時，就發現共產份子滿天飛了。

（轉入第十版）

（接自第九版）

第三，根據「公開的革命」說，冒險份子企圖陷害行動黨。我們不管這種陷害是一種秘密的陰謀或者具有多大理由，可是我們能夠看到的是，這批冒險份子是一批一批被送進監牢中去，而那些曾被陷害者，却在安樂椅中享樂。怎麼會是那些想害人的人反而先身陷囹圄而那些受害者反而相安無事呢？這到底是誰陷害誰？這只有讓那些曾經細心研究過共產主義著作的大人先生們或是「公開革命」的作者來回答這些問題了。

八二二後的行動黨

「八二二」事件就這樣成為歷史的遺迹了。可是，八二二事件替右傾機會主義者留下一條乾淨的大道。政府不但替行動黨掃清了「冒險份子」，而且行動黨本身也在配合政府的行動：「公開的革命」中寫道：「黨自從八月以後，就無情地剷除不可靠和不忠誠的份子。」

就是這樣，行動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因為它不再受到內部的不忠和背叛分子煩擾」而勇往直前了。

我們說，「八二二」事件過後，行動黨決定走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沒有錯的。

因為看一個政黨是不是走右傾路線，是以它反殖民主義的程度來鑑定的。這就是說，在反殖民主義是成為全民的中心任務的時候，假如有一個政黨不要反殖，或有意無意之間將人民的反殖目標轉移，替殖民地的百死千瘡的身體貼膏藥，粉飾太平，就是右傾。行動黨在「八二二」事件以後就是跑這種路線。我們可以從行動黨四周年紀念特刊中，一篇由中央執委會發表的論文：「獨立後的新形勢——我們的任務和政策」中清楚地發現這一點。

我們在這篇洋洋萬言的政策聲明，我們只看到「獨立後的新形勢」，「為什麼聯盟政府反對合併」這些大問題，以及佔絕大部份的篇幅是在分析「從整個世界看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當我們看完了這篇文章後，我們會感到迷亂或陷入于五里霧中。雖然文章的題目是「我們的任務和政策」，可是我們不能夠具體看出，什麼是行動黨的當前任務，什麼是行動黨當前的政策。

为了不使別人嘲笑我們的無知，或對行動黨的政策一竅不通，我們不妨像學生做筆記一樣，大胆地把它歸納為下列幾點：

獨立後的新形勢是：聯合邦獨立了，星加坡要自治了，星加坡要獨立只有通過聯合邦的合併才能達到。

「我們」的任務是：創造合併的條件。

至於反殖民主義的問題呢？那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怎樣不簡單呢？可惜我們並沒有在文章的其他地方看到。

在這篇文章中，是特別強調形勢的改變：

「在這時期裏，馬來亞的歷史行程已經改變了。……現在，檢討我們的地位和再說明我們的方針與目標的時刻已經走了。……

因此，重新評價形勢和重新說明我們最近將來的任務的時候已經到來了。」

我們同意，假如國家產生了新的形勢，我們是有必要重新檢討我們的任務和政策。可是我們在那個時候，看不出有什麼重大的局勢趕着變化。聯合邦雖然取得獨立，但是英國尚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英馬聯邦條約束縛着馬來亞，緊急法令沒有取消。而星加坡却還是老老實實地是英國的殖民地，到底形勢有了什麼改變呢？

這就是行動黨內聰明的政治家聰明的地方，他們就是要在那種形式上的變化來耍花招，弄到人民不知何去何從，於是他們就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是時，人民明明是受殖民地的統治，他們說：不是了。當時，人民的中心任務明明是反殖，他們說：是合併。

合併論的理論基礎及其目的

就是這樣，合併成為天之驕子，成為只可看不可摸的肥皂泡。「合併論」成為行動黨理論的核心，也成為行動黨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的擋箭牌。

合併是星馬歷史發展的需要，是符合人民願望的。可是要合併，只有在反殖民地的基礎上爭取合併，而不是理論上的空喊合併。正如一對兄弟被人分別鎖在兩地，只有兩人同時掙脫枷鎖，才有可能在一起，而不是雙腳被扯住而口喊說：「來啊，來合併。」所以要合併就要繼續反殖民地。

那麼，為什麼行動黨要將合併形容為好像是月宮里面那位漂亮的嫦娥，作為我們追求的對象呢？難道他們愚蠢到不知道要合併只有反殖這個事實嗎？這就是它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在作怪了。

行動黨所以要提出合併是有下列幾點原素

第一：轉移人民的鬥爭目標。因為當時行動黨看到英國有龐大的軍事力量，而聯邦又出現了一個右翼政府，因此對於星洲人民的反殖力量感到懷疑，就準備取消反殖。可是不反殖，又不會得到人民的擁護。於是就提出「合併論」向人民宣傳說現在只有星馬合併來達到新加坡的獨立。因此將人民的視線集中在聯邦的身上，而將真正的敵人給忘記了。

第二，在制進步力量。因為進步力量是反殖的主流，而行動黨本

身又不反殖，又害怕進步力量太大，因此提出合併來說嚇這些人，「喂，聯邦不要太多華人，太多左翼，你們不要破壞星馬關係」。於是減少華人，減少左翼就是制造合併的條件。壓制進步力量的發展當然也是條件之一了。

不要反殖民主義，限制左翼發展向聯合邦右翼政府求合併，却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寫照。

大選後的右傾表現

大選後，行動黨的採取的政治路線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繼續而已。我們說繼續，是因為行動黨的政治路線有所改變。所不同的是，現在他們已經成為執政黨，已經掌握有國家機構，因此，要執行右傾的政治路線是更加方便而已。

大選以後，的確是能夠讓人民自由地呼吸到幾口的新鮮空氣，政治氣候也清爽開朗，人民是沐浴在歡樂喜慶的氣氛中，一切都是這麼令人興奮，一切都是這麼美好，人民都將這一切的成就歸於人民反殖的大勝利。

行動黨就很巧妙地利用人民這種歡慶的情緒，將之導為是人民大翻身的日子，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把目前我們還是一個受到人統治的國家，形容成為人民今後要自掌政權。將尚是大權在握的殖民地主義者推到人民後面，於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創造經濟繁榮，解決失業浪潮，擴張工業等成為中心問題，反殖民地被打入冷宮。

為了更加了解起見，我們不妨將行動黨執政後的右傾表現詳述如下：

（一）不積極反殖

不要求積極反殖是行動黨執政後一個最突出的右傾機會表現。因為在今天，當人民的最主要敵人還是殖民主義者的時候，誰是真正反殖民主義，誰是假的甚至是騙人的反殖民主義，人民是一眼就能够看穿的。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行動黨在上台前，已經替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作好了理論上的準備，不過，為了爭取人民的支持而能在大選中得勝，在反殖民主義的行動上，作了許多形式上的工作。可是，到了上台以後，到了掌握國家的權力機構以後，行動黨是更積極，更加堅決地執行其右傾妥協的機會主義路線，他們拚命的向人民宣染獨立後的馬來亞已經不是一個反殖民主義的簡單問題，向人民誇耀自治後的星加坡是屬於人民時代的星加坡，是星加坡人民大翻身的日子，政府的權力機構已經是由人民的選出來的民選部長在管理。總之，一切都是美好的，把還是在殖民統治底下的事實形容為「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局面；把百孔千瘡的社會制度粉飾為「天下太平」，就是這樣，他們錯誤地問人民說，現在是馬來亞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

是經濟繁榮，工業擴張的時代，是提高生活水準，改善生活待遇的時代。

作為一個由許多聰明能幹的政治家所領導的行動黨，難道真的被鬼蒙住了眼睛而看不到今天人民真正的任務還是反殖的事實嗎？假如我們相信行動黨看不清這事實，那麼，我們自己不是犯上政治無知的幼稚病，就是太過於相信神話。行動黨對於殖民主義還存在的事實是比誰都更加清楚。請看李總理的話：「我們應該記得，新憲制並沒有給我們完全擺脫殖民主義的自由，在外交事務方面，防務方面，以及牽涉到外交與防務的內部治安方面，政府的權力都受到限制。甚至在我們所得到的，跟其他國家建立貿易和文化關係的權力方面，也受到英國政府的條約的控制。殖民主義並沒有完全消滅，這只是以一個比較不明顯了，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形式出現。」星洲日報8月9號。

也許有些人會問，既然行動黨知道殖民主義並沒有完全消滅，為什麼行動黨不堅決反殖呢？問題就在這裏。

讓我們來分析行動黨不反殖的原因，對我們是會有幫助的。

行動黨不反殖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幾點：

第一：害怕殖民主義者的勢力。

行動黨對於殖民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的潛在勢力是會感到一陣心寒的，特別是看到了殖民主義者武裝配備的軍事力量，以及英國欲將新加坡作為東南亞的軍事根據地感到恐慌，而認為像新加坡這樣一個彈丸小島，任何強大的革命力量，英國都有可能在一夜中就撲滅了。因此，行動黨非常害怕羣衆激怒殖民主義者，警告羣衆不能有過高的要求。

第二：害怕羣衆力量的發展

羣衆力量的發展是在反殖主義運動的基礎上發展的。也就是說，行動黨要是積極領導人民反殖，那麼，羣衆力量就會跟着逐漸壯大起來。這是行動黨不願看到的情形。這是行動黨感到最狼狽，最矛盾的事。因為發展羣衆運動，就能够加強其本身的力量，可是，當羣衆運動發展到高潮時，則又害怕羣衆不聽他們的話，怕羣衆做出過份行動，因此，採取又要反殖的路線的，就是使羣衆力量不容易發展的最好方法。

第三：害怕聯合邦右翼政權

聯合邦獲得獨立使行動黨感到非常氣喪。就像在反殖民運動中有人遠離他們而去，於是就感覺到自己勢單力孤，感覺得自己來反殖民主義似乎是不可能的。於是就大放悲觀論調，說什麼只有依靠聯合邦才可以反殖主義，說什麼只有通過星馬合併才有可能獨立。但是，當他們發現聯合邦政府對於合併問題，甚或能在英國的立場而敵視行動

黨政府時，更感到前途茫茫。而且更加認為，如果新加坡人民繼續反殖，將招致聯合邦更大的敵視。因此，只好向聯合邦右翼政府討好，拍媚，反對當地人民反殖。

這些是行動黨所以不反殖的原因。

（二）建設國家論

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使馬來亞成為繁榮幸福之樂土是行動黨上台以後向人民灌迷湯，擦麻藥的最拿手把戲，他們向人民吹噓現在是建國時代，不是反殖時代。「今天選舉已經過去了，我們面對着的是艱巨的建國工作。」（注39 4-6-59）「在目前的階段，我們的最要任務就是埋頭苦幹，為建設一個健全和繁榮的經濟而努力」，甚至他們大選後的第一年形容的「建設的一年」。

我們并不反對，在朝向一個社會主義邁進時，當然首要的問題是國家建設的問題，但是必須認識清楚，這個國家必須要有完整主權，它必須要能够在國家申行使任何的權力。假如這個國家的權力向部分地操在外人手中，特別是經濟基礎尚定殖民地型的經濟，資本在外國資本家手上，這就意味着這些外國資本家還有其合法的權力來剝削本國人民搾取本國資源，這樣要來進行國家建設的工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經濟繁榮，就是繁外國資本家的榮，本地工商業就根本得不到繁榮的實惠。其實，假如不從政治上完全擺脫殖民地的統治，而想避重就輕，推行經濟建設將是事倍功半的。從行動黨兩年來努力進行工業化，進行建設工作而忙到滿頭大汗，透不過氣來的情形，就可以完全証明這一點。因此，我們認為，行動黨提出「建設國家論」不但犯了政治短視，倒置的毛病，而且也企圖使人民看不到真正的問題——反殖。這是右翼機會主義路線改良主義的另一表現。

（三）幾股勢力論

將本邦所有在政治壇上活動的人物，很明顯地劃分為幾個集團，或稱為幾股勢力是行動黨一套政治哲學和政治策略，因為經過這樣一劃分，就有一種叫殖民主義的英國勢力，一種是共產主義的馬共勢力，一種是左翼冒險份子，一種是瘋狂左翼份子，一種右翼反動份子。那麼自己呢？就是最「正統」，最「進步」，最「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勢力。於是乎，就邏輯地結論說：只有行動黨才是人民的救星。

這種幾股勢力論的政治策略，具有下面幾個特性。

（a）圓滑，（b）漫罵

勢力論的第一特點是圓滑，意義就是說，這種策略雖然不一定要

（轉入第十一版）

（接自第十版）

八面求圓，處處向人討好，可是圓滑的手段，不論在什麼地方，不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適合，因為它圓，所以它容易「轉」，一下子可以轉左，一下子又可轉右，有時候是人家叫他轉，有時候又可以自己隨意亂轉，在高興的時候可以團團轉，圓而不滑轉的時候會有摩擦，會有阻碍，故必須要滑，譬如在反殖民主義最高潮時殖民地統治者失勢時，它可以將矛頭轉向殖民主義者，可是到了殖民地統治者發兌時，或人民失利時，則又可以轉回來向人民恐嚇，扳起革命家的面孔。又因為滑，故可以鑽，可以在這幾股勢力中間鑽來鑽去，有機會的時候可以踢幾腳，鎚幾拳。所以我們說：幾股勢力論是希望從人民與殖民地之間的矛盾刮到利益，希望在幾股勢力中尋求發展。

我們說勢力論的第二特點是漫罵，意思就是說：它可以捕風捉影，隨意亂罵，實際上，由他們製造出來的什麼幾股勢力，都一定可以罵的，例如什麼「瘋狂左翼」，「冒險左翼」，「共產黨」，「殖民主義」，既然「瘋狂」，「冒險」，難道不應該罵嗎？所以在高興的時候，可以拚命製造多些勢力，多些名詞，像「左派幼稚病」，「左翼衝動勢力」，「盲目左翼」等則本邦政治勢力可由最初三股增到十幾股，於是又可以一個一個指著大罵一場了。

可是，不管勢力論是有如何圓滑與聰明的地方，但他不能隱藏一個真正意圖，就是，把反殖民運動形容為三角對抗賽，企圖使人民相信，今天本邦最主要的矛盾就是英國勢力和共產黨勢力，這二股勢力是勢不兩立的，因此作為非共或民族主義者，就不應該介入這場鬥爭

，使這二股勢力打到頭破血流，人民可以完全不管，正如李總理所說的：「如果遇到左翼冒險份子和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衝突時，人民行動黨將任他們鬥到頭破額裂。」這是多麼理直氣壯啊！原來幾股勢力論的目的是要別人去火拚，而自己却袖手旁觀，坐收漁人之利。但是我們要大聲地質問：今天到底是誰在統治我們？是誰在壓迫我們？如果今天本邦局勢像國際一樣是東西兩集團對立，民族主義者走中立路線是對的，但是也不希望他們火拚，開戰。可是在本邦，我們明明受殖民地直接統治，我們無論具有什麼堂皇的理由，也要反對他，所以想要在反殖事業中，置身度外是癡人說夢，自欺欺人的。另一方面尚有一種更大的陰謀就是他們把本邦勢力分為三役，英國和共產黨是死對頭，必然會火拚，而非共集團可以置身度外。根據這樣的邏輯來分析，就有一個結論：共黨反英國最堅決，要是誰堅決反殖民主義，那當然是共產或者親共份子，這樣，任何的反殖民主義運動就是共產黨和英國的鬥爭，作為非共的民族主義者就可以隔山觀虎鬥了。這是一種多麼奇妙的魔術似的政治策略，可是含有多麼狼毒的陰謀啊！

這就是行動黨勢力論的本質及其危險，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具體表現。

（四）民主議會制

假如有誰今天去批評議會民主制度一無可取，則是非常愚蠢的，但假如有誰相信，在一個內部權力尚部分控制在殖民主義者手上的社會，能够真正施行和發揮議會民主，也是不會太聰明的，行動黨是犯有這種毛病，就是太過分地強調議會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而忽略了國家機構尚在別人手中，為什麼行動黨

要粉飾這種行式上是民主實際上不民主的議會制度呢？它是不是企圖在人民的思想意識上影響人民，使人民以為現在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優越的民主議會制度里，對於社會制度無須作重大的改革呢？這是值得我們懷疑。因為根據行動黨的說法，既然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而優良的社會，澈底消滅殖民主義，推翻殖民地制度便成為沒有必要，那麼反殖就無從反起了。這是行動黨要保持現狀，走右傾的方法之一。

在全星工團慶祝自治政府成立時，李總理說過：「我必須向大家指出，我們的國家是實行民主制度，我們是依照這個制度的方式進行工作，而成為執政黨。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鞏固這個國會民主制度，使它在本地發揮最大的作用。」我們要問，國會民主制度是誰制定？是不是根據馬來亞社會需要而制定，抑或是英國人一手安排的？前陳總理次長坦白地告訴我們說：「這個政府就是根據西方，特別是英國國會民主制度產生的」事情是非常清楚，一方面是內部大權不在自己手上，一方面又是承繼別人的制度「使它在本地發揮最大作用」是不是有可能呢？這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我們必須重新強調，我們是信仰民主制度，我們希望真正地，符合實際內容的國會民主制度會在本地順利執行，但是，首要條件就是反殖民主義，掌握有自己完全的權力，我們才有成功的希望，這就是我們和那些還沒有完全內部自治就大談民主制度的人惟一不同的地方，這也是我們說行動黨錯誤的地方。

（五）經濟繁榮及工業安寧論

大家都會知道，經濟結構是社

會制度的最基本結構。也可以說：有怎樣的社會制度，就有怎樣的經濟結構。本邦是一個殖民地主義社會，所以經濟結構也是殖民地型的經濟結構。因此，要使經濟結構改變，要使經濟繁榮發展，必須要先打破社會制度對它的限制。就是說：要想根本改變殖民地型的經濟，就必須先從政治着手，人民先有了行使權力的國家機構，才有可能發展經濟，如果不了解這種重要性，企圖用捨本逐末，頭尾不分的方法來解決本邦的經濟難題，是注定沒有成功的希望的，行動黨就是犯了這種錯誤。

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行動黨為了尋求解決本邦不斷增長的失業浪潮，為了要使本邦工業得到擴展，於是拚命吸引外資到本邦投資。另一方面又不努力和積極地鼓勵和協助本邦民族工業的發展，這種方法所導致的結果，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本邦的經濟發展有呈現出一定的蓬勃現象。實際上這潛伏着一個嚴重的危機。因為外資在本邦發展，就意味外國資本在原有的基礎能更加鞏固，就意味着外國資本在本邦政治上更加具有影響力。因此，只顧工業發展而忽視了接踵而來的危機，是行動黨經濟政策的嚴重錯誤。

為了保證工業發展政策能够順利地進行及得到良好的成績，工業安寧就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口號。根據行動黨的解釋，工業安寧必須是在公平合理對待工友的基礎上才能够執行的。我們非常不了解，工業安寧的定義既然是工人不能運用罷工的合法手段，來爭取本身的利益，怎麼會產生公平合理對待工友呢？因為在一個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底下，工人尚要受資本家殘酷剝削的社會制度底下，要求絕對的工業安寧就如同要求資本家不要剝削

工人的道理是一樣的，因此要真正的工業安寧，只要建立在勞資互利的原則底下，政府真正保證工人的利益的基礎下，才有可能實現的，如果僅僅只求形式上搬弄，在實際上又要限制工人為爭取本身的利益而展開的鬥爭，是虛偽的。行動黨就是犯了這種毛病。

以上五種論調只是行動黨執政後的右傾表現，其他如，合併論，排斥左翼力量，害怕羣眾團體，玩弄種族主義手法。等等右傾理論和做法，真是屢見不鮮，枚不勝舉，但因上文對這些問題都有談過，故不在此再詳述。

三、小結

今天，行動黨會陷於「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境界，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這種必然性是由其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決定的。

在反殖民主義方面，行動黨是採取動搖、妥協、右傾甚至是取消的態度。

在對聯合邦右翼政府方面，行動黨是採取討好、諂媚、「求同存異」的態度。

在對左翼力量方面，行動黨是採取限制、排斥、打擊、求異不存同的態度。

在羣眾路線方面，行動黨是採取脫離羣眾，害怕羣眾，不聽取羣眾意見，傲慢傲慢的獨斷獨行的態度。

所有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的表現，是施行這種路線的結果，所以，行動黨有今天這種下場是必然的，這也證明了一個政黨的生命源泉，是來自廣大的人民羣眾的意志和力量，當這個政黨喪失了這個生命的源泉時，正如一朵黃花種在遼闊的沙漠中一樣要枯萎和死亡。

續「透視大馬來西亞計劃」

利益後，她一定會在這些區域發動新的紛亂，如果我們觸覺够敏捷的話，我們現在應該停止印尼移民自由入口，如果容許大量的印尼人入境，到將來，耶加達方面的政府一定會說：北婆已有部分土地是印尼的而且尚有如此大數目的人口，到那時事態便嚴重了。」從這份能表達英官方意見的撰文中，我們有理由相信：

（一）殖民主義者已認定印尼是會取回北婆三邦。

（二）時間是印尼在解放西伊利安後，矛頭便會指向自己（殖民主義者）這方面來，因此。

（三）殖民主義者必須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以保全它在這些區域的勢力和利益。

今後，照大合併倡議者的意向，比較大的可能是和北婆三邦以聯邦形式併入馬來亞，一旦三邦各以一州統屬馬來聯邦時，根據上面

談述，英國在五邦中之利益安然無損，勢力依舊堅固地盤踞在這些區域，可是，若印尼再提出取回三邦領土的要求時，矛頭已經不是針對殖民主義者而是馬來亞了。且看，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迴避。那時，若不幸有任何紛爭發生，甚至惡化到破壞以萬隆亞非會議指導的睦鄰的和平共處原則，也似乎是馬印雙方的事而與英國無涉。這種只須策動五邦大合併的「奇步」，就可不費吹灰之力而收得漁人之利——制發印尼提出收回領土的要求；迴避今後印尼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厄運；製造鄰邦的紛爭，達到轉移反殖的鬥爭對象——是老奸巨滑的殖民主義者的一貫手法，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五

「新加坡僅是彈丸小島，人口過多，沒有資源又沒有市場，所以經濟不能自立，若想孤立新加坡，一旦水源被切斷，唯有死路一條」的悲觀頹喪的論調，何止千百次被

提出，在散播、在「發揚」着。可是，怎不急煞人，不「馴服」的人民，自始至終「執迷不悟」，不信服這種「理論」。所以，現在唯有多尋找證據，來馴服人民，於是，高喊嘶叫「星加坡不能獨立生存的，我們沒有抉擇，只有支持大馬來西亞計劃以求生存！」幸福我！星加坡先天「不足」，果真「得天獨厚」，千載難逢的大合併賦予本邦「生機」。這時還管得着反殖、主權……。總之，一切都好辦了。「望眼欲穿」的理論根據終於求得，用種種原因，而說明星加坡不能獨立生存進一步獲得證明而正式宣告「成立」了！

今天原則上支持大馬來西亞的計劃存有證明所創「理論」是正確的意圖嗎？諸位思之！

六

誠如布斯達曼指出的：「大合併有二種，一種是出自五邦人民的，一種是英國策劃的，今天所推行

的大合併是屬於後一種。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所以，基於大合併是屬於五邦人民的共同問題。社陣便倡議舉行五邦所有社會主義及反殖民主義的各黨會議，「揭露存在各別國度里所有破壞人民團結及損害種族和諧份子的一切陰謀，以期此會議的結果會促使汶萊、砂拉越和英屬北婆羅洲的憲制改革，俾人民在最近的將來能獲得自治和獨立」。（註六）星馬北婆三邦明顯表明了他們的大多數人的意見，歸納起來有：

一、大合併的問題，不是五邦人民當前的迫切問題，五邦人民當前的急務是反殖民主義，爭取自治和獨立。

二、五邦的政治地位懸殊，例如馬來亞已獲得政治上的獨立，星加坡踏上「三須古」自治，北婆三邦除汶萊自稱自治外都仍然屬於殖民地，這種政治懸殊的現象沒有消除前，五邦不能合併。

這些都是明眼人的意見，也就是對通過「大合併而達到加速取得獨立。」說法的間接否定。因為，正當五邦人民正在大力反殖，任何人若立意在五邦中澈底消滅殖民主義勢力，而相互支持五邦的反殖鬥爭是完全正確的。不過，我們肯定認為，相互支援方式雖多，但今天若想通過「大合併」支援五邦加速結束殖民地。必然要遭到失敗，甚至有可能帶來不幸後果的。所以，五邦人民繼續進行反殖民運動，爭取自治與獨立，是我們當前的急務和正確的走向，不容被歪曲或轉移的。至於大馬來西亞的計劃的問題，則交由人民去決定，最終必然可以得到五邦所滿意的解決辦法。

註一、25—7—1961 新聞報

註二、12—7—1961 新聞報

註三、10—8—1961 星洲日報

註四、沙勞越新聞處稿

註五、17—4—1961 婆羅洲報

註六、20—7—1961 星洲日報

巴西主權被侵犯

巴西位在南美洲東部，面積有南美之半，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國家，它的海岸高原中央盛產咖啡、棉花。咖啡產量佔世界第一位，向來有「咖啡王國」之稱。南部蘊藏着黃金、鐵、煤、石油……。物產非常豐富。

拉丁美洲總是美國的「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地方。所以，一路來巴西大部分的資源受着美國資本集團所壟斷。大量投資經營，壓制民族工業的發展，造成巴西國內通貨膨脹，財政上不斷的出現赤字和外匯的短絀的現象。扼殺了巴西國家經濟之正常發展，致使巴西經濟情勢益發惡化，那是絕對無法掩飾的。于是拉丁美洲人民急切地要求擺脫外來的經濟侵略，扭轉人民生活日趨貧困化而引起的廣泛不滿和不安。

自從拉丁美洲人民舉起了民族運動的旗幟，巴西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樣，不落人後紛紛響應。終于在人民的努力奮鬥下，好不容易迫使外來統治者的讓步而取得了政治上的自主權。這幾年來，巴西在新形勢的有利條件下所採取的政策說明了：多年來飽受外國勢力在政治上的統治，經濟上的剝削，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被剝奪而長期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巴西人民，將在勝利的基礎上，繼續向政治，經濟的真正獨立的目標勇猛推進。伴隨世界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反壓迫、反侵略；要求和平自由、民主、獨立運動高漲的有利形勢下，以柯羅斯為首的巴

西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沒有猶豫地選擇了一般新興國家所採取的中立路線。這道路無疑有助於巴西掙脫外來勢力的操縱和任意擺佈的命運。然而這種有利巴西人民利益的政策，始終不受高唱民主，嘶叫自由的美國所支持。因為它直接損害到美國在巴西的經濟利益。於是，不顧世界輿論譴責，近乎瘋狂地勾結過去應用奴才政策培養起來的傀儡官員和當地軍閥，粗暴而有步驟干涉巴西內政。乘其副總統出國談商貿易，迫使信人民任的柯羅斯總統的辭職，阻止副總統蓋拉特之依憲法回國就任。我行我素地強制修改憲法，削弱「異己」的總統實權。這一切都說明巴西的自主權遭到了美國殖民主義者的惡毒摧殘和破壞！

當總統被迫辭職後，巴西工人罷工，學生展開示威，即刻激發浩大的聲起反美運動。盡管美國「掩耳盜鈴」似地澄清美國與巴西政變無關，然而，巴西人民對美國殖民主義者的態度就是明確而肯定的答案了。請做賊心虛的殖民主義者緊記住，若企圖再用花語巧語來欺騙覺醒了的世界人民，將會是徒勞無功，歸根結底要失敗的。

侵犯巴西主權干涉內政，是巴西人民不能容忍的，也是世界人民不能坐視的。我們必需聲色俱厲地譴責殖民主義者粗暴干涉內政的罪行！

★★★

和平解決柏林問題

柏林是歐洲緊張局勢的策源地，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就一直成為東西方冷？熱戰尖銳化的焦點地，在柏林的區域里，除了東西兩個德國的軍隊外，還駐守着四大強國的軍隊，由於這種特殊的情況，造成柏林問題成為難以解決的局面而且是應該加以解決的。如果繼續保持柏林共管的現狀，始終是對世界和平起着重大的威脅，這在於柏林位置在東德境內，給與為戰分子活躍與挑釁的機會。

世界和平力量不論在精神與物質上，都大大地超越了戰爭的力量，世界人民一次又一次在各角落表示出他們熱愛和平，反戰的精神，和平陣營的物質力量也足以給侵略性行為（毀滅性的）反擊，在維護和平中起着絕大的優勢。

戰爭已不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靠軍備緊張發財致富的幻想也不可能。對解決柏林問題應該用談判的方式，但也絕不容許以和平的空談掩蓋着擴軍備戰的真面目。

在柏林問題上玩火的企圖是危險的，美國軍事評論家基辛卡的「小規模戰爭」的論調是史行不通，正如西德軍人兼政治宣傳家所說：「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的武裝力量只有在西柏林排起武裝衝突，聯邦國防軍才不致陷於孤立，西德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伙伴才必然牽連進去。」這一段話說明了瘋狂的「局部戰爭」的想法已是過時，只要戰爭在柏林一被排起，就會釀成世界大戰。冷戰的寒風吹襲西柏林是西方癡癡以待熱心機所要求的，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冷戰對於資本主義帶來好處，美國經濟學家華

勃格就已指出：「如果冷戰中突然出現和平，我們的國家就可能發生嚴重的蕭條現象。」西德好戰份子也正希望戰爭能從柏林排起，才會引致北大西洋盟國共同參戰，才不孤立，西方國家也給與西德復仇主義份子以大力發展的機會，武器集中西德，扶植西德在歐洲經濟中躍登了第一流的地位，在政治上扮演着重大的角色。

所以，要澈底的剷除西柏林所能帶來的危機，使它不致成為好戰者發動戰爭的策源地，唯有消除西柏林所具有的畸形現狀——四強占領的共管狀態。這樣才不會使尖銳化矛盾在此緊張的區域短步相接，各國的警備的軍事武裝從西柏林撤除，為西柏林達致和平，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而努力奠定條件，一切間諜活動足以危害對立方面安全的做法與好戰黷武的行徑也應該停止，使之消聲匿跡。在這問題上西方國家是必須尊重東德的獨立主權及承認東德獨立的事實才有可能解決問題。今天，對於在德國領土上存在着兩個獨立的國家是一項不容否認的實事，掩着眼睛，充耳不聞的論調是愚昧的。因之，各國應拋棄以往之偏見，承認東西德的存在，進而締結對兩個德國的和約。我們相信，締結和約不但能够很好地清除世界兩次大戰對德戰爭中的，建立起對德總戰爭的國家和東西德之間的友誼關係，並且能進一步的緩和歐洲局勢，打開世界風雲緊閉的徵結，使東，西德人民在和平氣氛中接觸，為他們祖好的統一——德國聯邦奠定和解的條件。

·彤英·

續「試論國家的聯合問題」

土著」，不想歪曲西伊利安人民的心聲，讓我們確實的說一聲：西伊利安人民是耻笑那些喪權辱國者？

我們知道：國家的聯合，本質上是服從統治階級的利益的，而在新馬的合併上，統治階層是只能通過出賣式的合併才能對他們有利。

既然是出賣式的，倒退的合併，醜事見不得人，當然只能暗中進行，私下達致協議，等到萬事俱備，只須在議會中通過就是了。假如說明越多，反而暴露越大；最好是敷衍塞責的解說一下就算了。這就是當前執政黨處理合併的態度。

歷史上雖然出現了許多國家聯合的形式，統治階層雖然苦心孤詣要使到聯合是依照對他們有利的方式來進行，但為了使「聯合的生命」不至於太短，聯合的方式能在較安穩的狀態下進行，在處理聯合時，也不得不對人民的意志，作表面上的讓步，當然，讓步的程度要看右派的反動程度而定，但終究是看人民所能發揮的力量而定。

本邦社陣對 邦聯的立場

社陣在8月31日的書面聲明「我們的合併立場」中寫道：

「作為達到最終合併的一個步

驟，我們準備接受一個「邦聯」形式的憲制安排。

『內部安全問題，完全由新加坡自理；外交和國防權力，通過條約關係移交給聯合聯邦政府。

『我們接受聯合邦的國家元首……新加坡的公民對元首效忠。』

社陣明確的提出新馬最終合併的一個憲制步驟：即兩地通過同君的邦聯關係先來聯合，這種聯合是基於平等原則及照顧兩地人民的利益的。所有世界上出現的國家的平等聯合大都採取邦聯方式，它和不平等的保護及宗庸關係是完全兩樣的，不平等聯合的結果，必然導致衝突與吞併，假如我們要証明本身是個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就應爭取平等的聯合，反對不平等的措施，就應爭取實現真正的統一；反對虛偽的合併。

如果我們要統一，新加坡應成一州併入聯合邦，新馬組成聯邦國家，為了不使未來的馬來亞遭受殖民主義勢力的進一層束縛，新加坡首先必須從殖民統治者手中取回「完全的內部自治權」，這樣才能防止殖民主義勢力埋伏在新加坡的內部治安機構內去妨礙我國的治安。

假如兩地要通過同君的邦聯關係而聯合，作為未來統一的憲制安排，新加坡人民還是必須掌握完全的內部權力（特別是內部治安權）

，這樣才能符合「邦聯」的真諦，才能意味着新加坡的憲制地位升高一級。誰都知道世界上從未有兩個基於平等原則而聯合，其中之一國却未擁有內部自主權的。

總之：爭取「完全的內部自治權」，對「聯邦」，對「邦聯」，只有幫助；絕無妨礙。

必須指出

只要新加坡的內部自治權還被殖民統治者所扣留，「邦聯」，「聯邦」的任何憲制安排，都不能用來拖延1963年新英憲制的談判，那時新加坡人民是一定要爭回內部權力的。至於新加坡的外交，國防等權利，聯合邦政府若能拋棄種族及派別的狹隘成見，願意和新加坡人民共同向殖民統治者去爭取，去召開新馬與英國間的談判，新加坡人民已明確地表明了，當然願意將爭回的權利讓給聯合邦政府。倘若右派無論如何都不敢向殖民統治者爭取人民應有的權利，甚至阻礙人民取得應有的權利，那麼「喪權辱國」尤不知耻的「非民族」的罪名，人民絕沒有義務來承擔。

真正統一的「聯邦」方式的憲制安排，行動黨不要；朝向統一的「邦聯」方式的憲制安排，行動黨也不要；達到統一的起碼條件也即是憲制進展的最低要求——「完全

內部自治權」的取得，行動黨還是不要。我們真不明白，統統都不要，行動黨政府到底還談什麼合併呢？「羅惹」式的或「四不像」式的合併，人民是不會贊同的！我們認為：行動黨一直想把殖民主義者所搶去的「內部自治權」放棄，真是大大的不應該，若還執迷不悟，老是替殖民主義留權利，我特權，可以肯定是沒有前途的！

不管從那一點來分析，行動黨政府都不能實現真正的合併，然而高調既已唱出，收場可真困難，為了逃避指責，她便準備魚目混珠，以假亂真，打算把假合併代換真統一，在未來的立法會議辯草通過。

必須嚴正指出：即使行動黨的假合併計劃，在議會里得到其他右派議員的支持，僥倖多數通過了，新加坡170萬人民還是不會允許假合併計劃付諸實施的。

是不是人民會拋棄議會的民主鬥爭呢？不是的！因為議會的決定，有時雖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民意，可是不能充分反映民意的時候也很常見，尤其在這種殖民地的議會里，人民是沒有辦法掌握議會的一切決定的。當初人民選了行動黨執政，不等於即使行動黨怎樣變動都注定要支持她到底。現在立法議會里的行動黨只是超出一席的多數黨，她已經沒有充分的合法地位來單獨處理有關新加坡前途的重大問題

了。加以她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已遭受羣眾不滿，黨內眾叛親離，根本就不可能在議會中真正反映民意。

新加坡人民的 反殖鬥爭

實質上就是殖民地人民反對外來統治者的壓迫而爆發起來的民族自決運動。反對外來民族的壓迫，主要的是為了恢復我國人民的尊嚴及權利；因此，任何有關新加坡前途的安排，首先就得徵求新加坡人民的意見由人民決定，人民同意的計劃才有理由執行，人民所不能同意的，得趕快拋棄。

在議會民主的政治形式里，真正的民意決定，只有在普選中表現出來，所以，為了尊重新加坡人民的應有權利，民族主義者應該爭取在大選中把有關新加坡前途的看法及計劃，交由人民取擇。

過去芳林安順補選的結果，已經在一定的程度上開始反映了人民對行動黨右傾機會主義政治路線的不滿，未來的大選，人民是否將明確而澈底的否定行動黨的合併計劃？並把處理新加坡前途這重大問題的「委託狀」，交給能帶動人民共同展開反殖鬥爭與正確處理國家聯合問題的政黨及個人呢？關心時局者是能够清楚預見的！

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是空前的壯大，普遍地掀起了連串的反殖民主義鬥爭。正當阿爾及利亞的民族問題懸而未決之際，法帝國主義者又在這地方的右鄰燃起了一場新的戰火——7月19日，法國殖民主義者改變了過去長期的局部侵略面目，明目張胆地向突尼西亞人民展開了全面的喪盡天良的強盜式戰爭。

突尼西亞，這個新興的北非國家，今天已經在殖民主義者的蹂躪下，掀起了一股無比堅強的民族獨立浪潮。

遠在1837年，法國殖民主義者的魔掌已經稍稍地竄入這塊落後的土地上，進行其劫奪和奴役的殖民地勾當。1881年，貪婪無厭的殖民主義者變本加厲地更進一步以「突尼西亞部落侵略阿爾及利亞邊界」為藉口，強迫突尼西亞國王簽訂「巴爾杜條約」，正式成為突尼西亞的統治者。從此突尼西亞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就開始渡過和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樣痛苦的漫長歲月。

第二次世界大戰，突尼西亞曾一度落入德國法西斯主義者的手裏。1943年美國勢力擴張到這裏的每個角落，取代了德國而佔有這塊土地上的統治權。大戰結束後，在一種微妙的關係下，法國又捲土重來，美國勢力隨之撤退（但並不意味着美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已踪跡滅亡）。

隨着亞非民族自覺浪潮的日漸掀起，1951年，突尼西亞人民正式向法國殖民主義者提出獨立自決的要求，但都遭到統治者無理的拒絕，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武裝鬥爭就被迫在1954年展開了。在真理和正義的面前，突尼西亞人民的鬥爭，以堅強果敢的戰鬥毅力，終於迫使法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暫時放下那把血腥的屠刀，在1956年3月20日正式接受突尼西亞人民的獨立要求。1957年7月25日，突尼西亞人民廢棄了虛設無能的國王西迪·默罕默德·阿旺一世而正式宣佈成立突尼西亞共和國，「結束」了七十餘年的殖民地統治。

埋下禍根·衝突難免

話說到這裏，問題恰好發生在這裏。假如說突尼西亞人民的獨立是完整無瑕的話，也即是說：在突尼西亞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已經完全被清除，那麼今天的「比塞大事件」會發生將不知教人從那裏說起？同時，法國帝國主義者企圖挑起這場戰爭作為進一步侵略突尼西亞的跳板，也怎麼會這麼便當呢？由此可以料到其中必有一番道理。

事實正好說明了一切，法國讓突尼西亞人民獨立，並不表示他情願收拾起那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陳舊包袱，而乖乖地回到法蘭西的愛麗榭宮去。換句話說，突尼西亞人民所獲得的獨立，並不表示那股長期盤踞在這塊北非土地上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已經被完全的驅逐。相反的，法國帝國主義者的軍事與政治力量仍然留在那裏，佔有了比塞大軍港及其他地方。而且經濟上也間接地扼住了突尼西亞人民的咽喉。法國帝國主義者就這樣種下了今天比塞大事件的禍根。

其實，要求法軍撤出比塞大的事，早在突尼西亞獨立後不久就已經被提出來了。由於當時適逢阿爾及利亞人民解放鬥爭熱烈展開之際，法國又遭遇到空前的經濟恐慌和面對着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或明或暗地演進和擴大，並且，眼看着東方社會主義國家力量的日益強大，於是，法國帝國主義者就

製造出種種似是而非的藉口，狡猾地對突尼西亞人民的要求給予岩延不理。同時也不準備與突尼西亞人民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問題就在這種既含糊又不嚴肅的情形下，輕易地騙過了突尼西亞的人民，暫時緩和這場可能發生的矛盾。

但是，儘管帝國主義者如何熟練地玩弄其欺騙手段來緩和突尼西亞人民要求擺脫及剷除盤踞在他們身上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勢力的浪潮，事實却說明了紙是包不住火的！突尼西亞人民要求獨立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問題遲早總有爆發的一天。

這裏就說明了：「比塞大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場正義對不正義的鬥爭，一場民族獨立的鬥爭，反帝、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只要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法西斯主義存在的一天，像這樣的鬥爭就成為必然而不可避免了。誰要是抹煞了這個事實，誰就是在替魔鬼化妝打扮，在粉飾現實，或者不然，他一定是個苟且偷安的弱者。今天，我們可以同樣地指出，只要法國帝國主義者一刻不願放棄他的劫奪與好戰的法西斯意念，撤出其在突尼西亞領土內的軍隊，那麼這場鬥爭是沒有安息的時候，而且是必然會繼續下去的。

抱殘守缺·居心何在

一張血淋淋的魔掌扑向北非的土地上，比塞大的戰火已經燃起來了。從整個國際局勢中，可以看到法國帝國主義者今天是面對四面楚歌而被孤立起來，除了那些早已臭名遠揚的少數帝國主義國家隱隱約約地在幕後支持他外，幾乎是受到世界各個愛好和平國家的譴責。由此看來，法帝國主義的勢力要想再擴張侵略領土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今天他却仍然不肯甘休，不惜使出各種非人的手段，寧願犧牲一部份利益，作垂死掙扎，蒙受來自世界各角落所傳來的指責，却依然厚顏無恥，抱殘守缺地不肯放棄他的侵略意圖。看樣子他今天已經幾乎達到成為一個戰爭販子的地步了。他深知一旦失去了這個地方，將可能會使他不僅遭到致命的損失的話，至少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這是可想而知的。否則他又何苦去冒這場大險呢？

讓問題從比塞大軍港談起。比塞大市（Bizente），位在突尼西亞的北部，這裏有一個面積約莫20平方公里的大湖——比塞大湖，此湖與海口之間有一條長達6公里半的人工開鑿的水道，比塞大軍港就設在這裏。從這裏向西通到直布羅陀的距離是714哩，從東達至馬耳他240哩，而和西北面的法國本土的土倫軍港相隔420哩。法國之所以重視這個地方就是因為它正好與其本土的土倫港（Toulon）阿阿爾及爾的麥爾·埃爾·該彼爾（Mers. El. Kebir）互成犄角，扼住地中海海道的咽喉，可以控制地中海。在法國殖民主義者眼中看來，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這裏是一個最理想的原子彈指揮站；它同時又是北大西洋公約機構的主要軍事基地之一。因此，法國帝國主義者就在這裏設有兩個飛機場，其跑道可供現代化最重型的轟炸機升降，又設有四個

能修理最重型戰艦的船塢。更有許多設計巧妙，而能防原子彈轟炸的地下設備。

從這裏就可以看出法國殖民主義者對於這個地方不知已經揮耗了多少資金，費盡了多少心機，其目的就是在準備「將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見法國一旦失去了這個地中海最大和最完善的軍事基地，豈不教他前功盡廢，而且還失去了控制地中海防線的最有力據點嗎？再說，那位曾經在法蘭西的政壇史上演過一齣自編、自導、自演的歷史大喜劇的戴高樂將軍，他是自希特拉與莫索里尼頹圯之後，為當今世界的偉大野心家之一。曾幾何時，他已不知作了多少稱霸世界的幻想和企圖，他也曾經努力地想駕凌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之上。在沙哈拉大沙漠的原子炸彈的試驗；柏林問題咄咄逼人的蠻橫態度，完全表現了這位野心勃勃，好鬥成性的殖

民主義者的本質。可見，今天一個被他視為作為控制地中海及作為原子戰爭的理想指揮部的比塞大軍港，是絕不會被輕易放棄的。而且不要忽略了那個出資的美國佬，他也同樣有戴高樂一般的戰爭慾，必然是不願意他的朋友破壞他的美夢。這兩個人確實是在狼狽為奸，在蓄意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假公濟私·圖謀美援

該知道法帝國主義的長期的經濟危機，自從西德渡過了那曇花一現的經濟繁榮以後，經濟恐慌的命運就逼使他再也無法援助那好戰的法帝國主義者的經濟危機了。接着取而代之的就是美帝國主義。但是，美帝國主義者本身的日子也是不大好過，只是外強中乾而已。如果不是為了帝國主義者自身的利益，他確是不願意再擠出一筆又一筆的美援來。法總統戴高樂，在比塞大事件中就掌握了這個弱點，要一套假公濟私的手腕，從而美援源源而來。根據靈通界方面的消息稱：「美國曾一度表示，鑒於蘇聯對柏林問題之威迫，取得戴高樂的支持是重要的，比塞大問題畢竟是局部問題。」「這不是已說明了戴高樂已經捉住了這個馬脚，乘機揩油嗎？

確實，戴高樂這一手段要得真夠漂亮。要知道，比塞大事件只是其中之一斑。根據統計，從1950年到1960年之十年間，法國從美國手裏獲得的援助達4,502,053,000美元之多。這是一個非凡的數目，它遠遠地超過了台灣的美援，對於拉丁美洲來說更是小巫見大巫，於萬不能相及。難道那狡詐奸惡的美國佬真的不知道戴高樂的用心嗎？不然，那只是為了維護所謂「自由世界」的利益，以取得在與蘇聯的鬥爭中能夠步伐一致，可見比塞大的事件，戴高樂之所以不願意輕易地讓它結束，其目的原來如此。而且正當比塞大事件發生之際，柏林上面正是戰雲密布，雙方皆在劍拔弓張，整裝待發，美對法國的表示極力支持是不可少的。故此，這正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旦錯過就要後悔莫及。

赴突斡旋·用意瞭然

法突糾紛發生了，就在世界各個愛好和平的正義國家羣起而指責法國，並將以實際

行動去支持突尼西亞人民的正義鬥爭，堅決要求法國撤軍比塞大的時候，沒料到從半途閃出一個已失去東方社會主義國家信任，而一貫表現袒護西方的聯合國秘書長韓馬舍來。

韓馬舍赴突尼西亞斡旋法突糾紛，到底是真心或是假意呢？讓我們暫且不下定論。但是，以他一貫來對於民族獨立鬥爭的態度，不知道他曾經在何時何地有過一次站在正義的立場上，去維護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極力支持反對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鬥爭？相反的，我們所見到的却是無時無刻不在替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行為掩飾，做帝國主義國家的跑腿和「傳教士」。剛果和比利時的鬥爭事件豈不是一個很好的鐵証嗎？他不但不主持正義，讓剛果人民獨立，反而去替帝國主義者完成了今天剛果的分裂和混亂的局面，使到今天帝國主義勢力依然盤踞在剛果的土地上，吮吮着剛果人民的血！所以今天的比塞達事件，韓馬舍赴突斡旋，其用意我們是可以理解的。無非是要再作第二次的「剛果事件的調解人」，企圖依樣畫葫蘆！但是要知道，其背後還有一個導演。

善於扭轉殘局的美帝國主義者在這次的事件中，無疑地又是舊戲重演。可以完全理解到「韓馬舍赴突」就是這場好戲的一幕。他導演這齣戲的目的，不要忘記，他在比塞大也有和法國一樣的利益，他也是不願意突尼西亞人民的要求成為一個事實。但是盡管他苦心一片，無奈那頑固成性到底連美國國務卿魯斯克也承認的戴高樂的冷面無情，遂使韓馬舍得到一個狼狽的下場，只好大嘆倒霉就是了。

法國這次對韓馬舍出了這一招，豈不是「狗咬呂洞賓，不知好歹人」了嗎？但是不要忘記，這次的比塞大事件是一場正義的鬥爭，是爭取民族主權完整的鬥爭，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世界各處的正義國家皆異口同聲地對它表示關心和支持，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只要有眼光的人，既是戴高樂也應該看出不論任何形式的解決，法帝國主義者終歸要吃虧的。誠如「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格拉蒙所說的：「法國的前途是十分黯淡的。比塞大海軍基地之戰和魯格林避暑勝地的會談，是一枚錢幣的兩面，無論如何看來都是要失去的。」

就因為這樣，法帝國主義者是極不願意舉行任何形式的真正談判。比塞大的法國海軍司令安曼曾經表示，對於非洲的民族獨立鬥爭，只有用武力去鎮壓，任何談判是不必要的。這樣看來法國是不希望以和談解決糾紛，那只好怪韓馬舍不識時務了。

當第一幕戲的上演得到一個冷落的下場後，眼看着整個世界局勢發展的趨向，對法國並沒有好處的。而亞非國家倡議召開的聯大特別會員大會又是無法阻止，於是，美帝國主義者的第二聲開幕鐘又响了。他竟然煽動五個中立國家將議案「作較緩和的修改」。他曾經表示：「倘此等國家（亞非卅二國等）希望獲得美國及其他之法國友國支持此項要求者，必然修改此項要求之緩和。」這簡直是在助紂為虐，為虎作倀。但是陰謀畢竟是要被揭穿而正義定能伸張，亞非卅二個熱愛和平的正義國家所發起的聯大特別會議，終於在大多數票的贊成下通過了要求法軍撤出比塞大和突尼西亞國境的議案。美國在會議之前的努力又告吹了。

（轉入第十四版）

法國侵佔比塞大事件

剛平

英國與共同市場

玲星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開始從其繁榮的寶座，漸漸走向萎縮不振的道路，為了重振旗鼓，來一個翻天覆地的重建威信，英國曾提出在西歐成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它的成員包括西歐各國，這個計劃由於受了一定的阻力而宣告失敗。英國的登高一呼反而落得個狼狽不堪的下場，因為緊接而來的卻是法國積極的拉攏西德，同時受到美國在旁的鼓動六國共同市場便應運而生。緊跟着共同市場的成立，英國眼見大勢已去，便在匆促間成立了自由貿易區和六國共同市場分庭抗禮。因此，歐洲便分成兩大經濟集團，各組成國的明爭暗鬥，兩大集團的相互傾軋，使各國及集團間的矛盾日益加深。

為了使問題更清楚，我們有必要對共同市場及自由貿易區的組成及目的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西歐六國的共同市場亦叫歐洲經濟共同體，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廿五日成立，組成國為法國、西德、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它們以關稅壁壘形式限制非成員國國家商品的進入。對內則要求逐步實現勞動力和資本的自由流通，並調整六國間的經濟政策。因此，歐洲共同市場便從事於削減成員國的關稅率，預定時間為十二年到十五年而每年削減百分之十。

六國的聯盟對於英國來說無異是一種嚴重的打擊，因為危機重重的英國在貿易上又少了一個擁有一、六六億人的市場，為了削弱六國的貿易市場，加強六國共同市場的瓦解，進一步迫使六國不得不和其談判而鋪平英國能加入共同市場的跳板，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廿一日英國便召合了奧地利、丹麥、瑞典、挪威、瑞士、葡萄牙等六國——最近芬蘭已參加。成立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其目的對內則主張消除關稅障礙，實行自由貿易，對外則不要求建立共同關稅制度，各國有權制定各對外的關稅率。

近幾年來，六國共同市場在經濟競爭上，一般來講都比小自由貿易區佔優勢。再加以目前英國經濟的日益貧困，生產成本和物價的增長速度超過生產增長速度，對外貿易有了很大的逆差，因此國際收支赤字亦增大，造成了英鎊地位的越來越不穩定，這些說明了為什麼英國目前申請加入共同市場的原因。

續：法國佔比塞大事件

從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活動看來，儘管他是如何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慈祥老人，如何標榜着熱愛和平的旗號，終歸從他的好戰本質，完全可以暴露出他和戴高樂是一鼻孔出氣的。他的所謂「調解」或者「和平談判」也不外是和戴高樂的想法一樣，只不過是同一個內容的兩種姿態而已。所以，這次的比塞大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問題不是單純的，突尼西亞人民的鬥爭不僅是針對法帝國主義者而是針對着整個帝國主義陣營。

攤牌局面，何時了結

亞非卅二國的提案終被聯大大多數的票贊成下通過了。但是法國帝國主義者却已經在過去一連串的行動上，言論上，向聯合國表示攤牌，不歡迎聯合國作任何有關比塞大事件的干涉，可以預料到這種攤牌的局面必

以上的分析簡單的提出了英國參加共同市場的內在因素，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我們有必要再探討一些英國參加共同市場的外在因素。

美國雖然介於西歐兩大經濟之外，但它對英國的參加共同市場的問題，扮演着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主要是西歐的共同市場的六國，多多少少要受美國牽制，肯尼地上台一反過去艾森豪威爾的排擠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政策，且麥米蘭在今年三月訪美時，大加勸說英國應放棄核子武器的研究，用心於參加共同市場而圖謀本國經濟的發展。這種從「拒絕」到「贊成」英國的參加共同市場，時間是這樣的短暫，畢竟使人看出有點蹊蹺。

其實，美國態度的轉變並不意味着英國取得其諒解或者美國同情英國當前的窘境，而是和當前整個國際政治，經濟的局面分不開的。不從這方面去分析，我們看不出美國背後實何算盤。

我們懂得西歐經濟的分裂，必然的會造成西歐國家政治上的分裂，對西方國家非常不利，尤其是去年所成立而受美國大力推進的「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此組織的成員國除西歐十八國外，還加入美國及加拿大，共為廿國，因此美積極號召英國參加共同市場，那麼在干預歐洲各國的事務上，便可獲得了較好的條件。

就經濟方面來看，英國如果加入共同市場對美國的經濟並無影響，因為美國在西歐六國的投資額為二十六億二千萬美元，在英國的投資則逾三十億元，英國如成為共同市場的成員國後，雖整個西歐設立共同的關稅，對美國貨物的輸入可能有些影響，但是由於美國在西歐投資的龐大，同時盤踞着西歐市場，因此英國的加入對其威脅不大，更何況可達到如美國商業週刊所載：「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擴大，使它有足夠的力量對落後國家的發展和西方軍事力量作出比目前更多的貢獻。」

其次，英國與共同市場國家比較起來，英國經濟的發展是遠遠落後，據倫敦「經濟學家」雜誌透露：西德工業生產總指數在一九五三年為一百，到了一九六〇年為一七

然會再繼續下去的。

對突尼西亞來說：如果法帝國主義今後仍然置聯合國的提案于不理，遂使聯合國特別會員大會的舉行成為無濟於事，即法國撤兵比塞大軍港仍然不能成為事實，那麼他下一步將往那裏落足呢？布奎巴總統曾經表示：「法國若繼續對比塞大問題之國際權威，置之不理，突尼西亞則將毫不遲疑地恢復武裝鬥爭，突尼西亞將獲得勝利，乃無可置疑者。」從這段談話裏，不是已經很清楚地意味着突尼西亞人民的鬥爭將是堅決的，不妥協的嗎？

事實告訴了我們，不管布奎巴過去的親西方政策在今後的鬥爭中將再重溫與否，無論如何，今天的比塞大事件已經告訴他，過去所走的路是錯誤的，即親西方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有如突尼西亞新聞部長瑪斯姆迪所指出：「西方跟法國的團結已在比塞大事件

九，法國為一七三，荷蘭為一五七，意大利為一八二，但英國只不過一二八。以工業品的輸出來說從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英國只增加百分之十五，法國及西德比英國增加四倍多，意大利和荷蘭分別比英國增多了六倍及三倍多。還有比利時和盧森堡也比其增加了將近一倍。這對於英國的市場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另一方面，如果參加了共同市場，那麼英國的工業資本家便可以獲得在這些國家投資的便利。由於以上兩點的客觀因素，也促成了英國參加共同市場。

還有共同市場的「哈爾斯坦」計劃將會在最近一兩年施行，此一計劃的實施，英國在關稅方面受西歐六國的歧視將會更加大，這又構成了英國參加共同市場之所以這樣迫切的另一原因。「哈爾斯坦」計劃乃是由六國共同市場的委員會所策定，這計劃在關稅方面是從一九六〇年七日起減低關稅二十巴仙到一九六一年再降二十巴仙以代替羅馬條約所簽定的原來每次減稅百分之十。這個計劃目前延期執行，如果執行的話，對共同市場內國家稅率降低，對外則增高，則英國貨物的輸出這些國家便又再一次受到打擊，而這些國家對英聯邦的經濟擴張也越來越大。

清楚了英國參加共同市場的內外原因，不難看出英國雖然有其如意算盤，但是美國及共同市場各組成國對英國的加入，也有他們的企圖，因而我們有理由懷疑，英國申請加入共同市場後，能否解決英國的政治及經濟問題，還是疑問重重，不可樂觀。

三

在申請成為共同市場會員國的英國，目前感到最棘手的就在於如何解決英國對英聯邦國家的特惠稅問題以及如何消滅代表英國本國各不同經濟利益的階級。至於說小自由貿易區的其他成員國並不會對英國起着很大的威脅，從去年來說：七國與「共同市場」的貿易達一一億美元，而小自由貿易區相互的貿易額只不過是三十五億美元。因此一旦英國參加了共同市場，這些成員國是會採取參加共同市場的步驟的。

如果有人說英聯邦的特惠稅制是能够使英國不會參加共同市場，我們覺得這種看法並不能充份的說

中獲得證明，我們不能繼續罪犯的同謀者。」可以完全使我們相信，受迫害的國家只能依靠同樣命運和熱愛和平的正義國家，只有他們的支持和援助才是真誠的，也只有得到他們的支持和援助，一切鬥爭才有前途。假如走上了親帝國主義國的道路，就等於與虎謀皮，到頭來還是要被咬一口，不可避免地要失敗的。在這次的鬥爭中，突尼西亞人民已經深深地理解到這點，誠如瑪斯姆迪所說：「比塞大屠殺案自然將影響突尼西亞人民的思想。」今天突尼西亞人民的鬥爭前途如此輝煌，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我們可以完全指出，不論今後的鬥爭是由一個怎樣的人物來領導，突尼西亞人民已經不願意再走妥協和幻想的親西方帝國主義的道路了。因此，接下來不管法帝國主義者將對聯大特別會議的議決案攤牌與否，或者

明英國為什麼參加共同市場的關鍵問題，充其量英聯邦問題只能稱得上是使英國碰上了了一個難題。

事實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如果英聯邦特惠稅的取消，英聯邦各國商品輸入英國時，便須納共同市場所規定的關稅，因此它們的農產品及工業品便會失去英國的市場，隨之而來的便是英聯邦和英國的經濟漸漸的鬆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英國不參加共同市場的話，英國和英聯邦各國由於受了西歐六國的競爭，英國對英聯邦的經濟貿易，亦不見得會穩如泰山。

以去年西歐六國在對英鎊區的輸出比一九五九年增長百分之十七，但英國只增加百分之九，必須同時指出，有些英聯邦地區，英國的輸入品更有下降之勢，如去年共同市場的組成國對羅德西亞及尼亞德蘭聯邦的輸入比一九五九年增多了百分之廿六。但英國卻減少了百分之七，在東非洲的輸入歐洲共同市場增加了百分之廿四而英國則減少了百分之一。這些貿易數字幫助了我們瞭解英國即使不參加共同市場，其與英聯邦的經濟關係也是漸走下坡。

英國一方面受了英聯邦的牽制，另一方面又受了本國人民，尤其是一批在英聯邦和殖民地擁有特殊利益的資本集團的壓力，代表英國壟斷工業家的麥米蘭也不得不在此申請參加共同市場時說了這句話：「英國打算爭取在有利的條件下參加共同市場」。由於英國經濟的矛盾再加上英國和各資本主義國的存在矛盾。我們深信英國正式參加共同市場還須和西歐各國進行長期的「磋商」和取得「諒解」。

四

英國的經濟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一環，因此英國經濟措施的有所變動，並不能只是英國內部經濟的問題，它所涉及的方面是相當廣。因此英國的所以申請參加「共同市場」的問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的探討。

我們認為英國的急於參加「共同市場」，正可以告訴我們西方國家對市場的爭奪進一步尖銳，這正好說明了西方經濟的不穩定性，如將之做為整個帝國主義經濟系統來說，應該是這種系統的矛盾日益加深，誰都知道建立在商品生產最高

形式的西方國家，市場問題的能否解決是決定着資本主義經濟的存亡、興衰。近二、三年來，西方經濟不很樂觀，以英國來說：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就像魔鬼般的跟隨着美國，工業生產在一年間下降了百分之七，英國經濟更是千瘡百孔，滿身傷痕，內憂外患，雲霧滿佈，工業生產從停滯不前而趨向下降，只有西歐六國在比較上來說，狀況些微良好，但也畢竟是黃昏夕陽，將瞬息即逝。

西方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亦是和英國為什麼參加共同市場的問題結不了緣。根據聯合國日報的統計，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〇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只增百分之十九，英國增了百分之廿八，但是，西德工業生產卻增了百分之八十，法國增了百分之七十三，意大利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二，荷蘭亦增高了百分之五十七，這種工業生產的巨大差別，正好顯示西方國家經濟力量的對比，首當其衝當然是英國，至於美國由於在共同市場的六國中的投資額是非常大，在「共同市場」的經濟力量是有一定的基礎的。

英國的參加「共同市場」不是西方各國的大團結，經濟合作的象徵，更不是如外國通訊社所形容為「歷史性」的，恰恰相反；英國的採取這種行動卻暴露了西方國家間錯綜複雜的矛盾。這種矛盾表現在美國的從反對英國到贊成它加入，也表現於法德兩國對英國所持的態度在程度上的不同，同時荷蘭對英國的決定表示歡迎也說明了這一點。儘管矛盾是這樣多，但是必須指出在矛盾的發展過程中，一些矛盾是會暫得緩和的，可是却為未來更尖銳化的矛盾埋下禍根。

五

施行了「共同市場」後的西歐六國，在經濟上的成就是：給予壟斷資本有大魚吃小魚的條件，賜予中小企業家卻是工廠倒閉，而最近法國農民的騷亂便是這「成就」的強烈諷刺，英國如果正式參加了共同市場，其處境是否會一樣，那就拭目以待了。不過我們認為一鍋的米煮不出兩樣的飯，可以這樣說：投入「共同市場」後的英國，是逃不出這種厄運的，「幾家歡笑幾家愁」，足以形容加入共同市場後，將來英國的人民生活處境。

將作出任何形式的攤牌，只要法帝國主義一旦留在突尼西亞的土地上，留在比塞大的基地裏，突尼西亞的和平是不可能出現的，唯有加緊進行反法帝國主義鬥爭，和平願望的實現才有可能。瑪斯姆迪也指出：「我不想調解，談判是必要的，大海開着，船也在海上。」

肯定了這一點，什麼才是這場民族獨立鬥爭必勝的保證呢？無疑的，亞非以及其他熱愛和平的國家的力量就是這場鬥爭的後盾。只要突尼西亞人民今天的鬥爭是堅決的，這次的事件，勝利是無庸置疑的。相反的，今天的柏林危機以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日漸擴大的矛盾，尤其是戴高樂的帝國主義幻想的日漸破滅，就是加速這場鬥爭的完成和勝利的催化劑。

一 什麼是宗教？

宗教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現實在人們意識中的荒誕的、歪曲的、虛渺的反映。

宗教相信有超自然的，非真實的本體存在，如相信人間有神、天使、魔鬼的存在，這種思想自然是荒謬的，但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它呢？從根本的思想根源去分析，人們之所以相信非實在的東西（神、鬼）是因為人們在自然力量的面前束手無策，無能為力以及恐懼的心理所造成，到後來，又為社會壓迫和摧殘，却又無力反抗而臆想出來的結果。

二 宗教是怎樣產生的？

原始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水平很低，原始初民的知識也是很低的，他們對於周圍的自然現象和自己的本性極端愚昧無知，所產生的觀念就是宗教。

原始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水平極低，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雷、雨、電、洪水、地震、風暴、嚴寒、酷熱、旱災、森林火災，疾病及死亡——自然界的自發的力量是無法理解的，不可思議的，是極端神秘的，初民對於這種可怕的、強大的自然力量感到毫無辦法，他們不能控制這種自然力量，於是就與自己類比，以為它們也是有意識的，以後就開始認為這種力量具有超自然的特性，並且把它們神化，認為有一種神的力量在控制着，後來試圖藉助符咒、祈禱和祭祀來求取這種力量的慈悲，這樣一來，在自然力量面前的軟弱無力和恐懼就產生了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觀念，相信神和靈魂，產生了對它們的崇拜。

三 宗教的發展

宗教並不是任何時代一切人類社會所固有的現象，文化史證明，在原始社會的初期並沒有任何宗教和宗教觀念存在，宗教只是原始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產物。

隨着階級社會和國家的產生，人們頭腦中的宗教觀念也隨着發生了變化。當強大的國家統治者出現的時候，人們才把神想像成高高在上的具有萬能力量的東西。

宗教的發展也反映着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氏族神轉變為部落神，由部落神再轉變為部族神，最後又轉變為單一的神。

自從地上出現了皇帝以後，天上也就同時出現了萬能的天帝。

原始部落不能理解自然現象，如人的死亡，在人或動物受傷出血過多而慢慢地死亡時，原始人就以為靈魂或生命力脫離了身體，在長期的生活中，綜合了各種不能理解的現象，以為萬物都有靈魂，萬物都有超人的神在主宰。

原始部落在社會發展法則支配之下，造成了氏族，這時圖騰與祖先的崇拜（以動物來代表該氏族的

象徵）代替了原始部落的神靈的崇拜，原始人的宗教觀念隨着經濟生活的不同而互異。如漁民們自然以為對打魚有幫助的圖騰，畜牧者自然以野獸為圖騰，同時，地理環境的不同，宗教觀念也不同。山民是信仰神是在人們不能到達的遙遠山巔之上，而海島或海濱初民就信仰海神，風神之類；隨着畜牧生活的發展，初民的生活漸漸和自然的生活有密切的聯繫，初民神靈的崇拜慢慢被自然神所取代，如游牧部落的祖先神為雷神，雨神或風神所取代，耕種部落的祖先神為太陽神或河神所取代；隨着農業的發展，人們對自然的依賴更大了。太陽的運行，季節和氣候的變化，草木的生死，河流的漲落使他們相信有太陽神或植物神在主宰着一切。在古代，太陽神非常流行，這與當時的農業經濟生活有密切的關係。

如基督聖像開始時是畫得和拯救那些不能忍受壓迫和苦難的救世主一樣，和現在是不同的；又如

當時的下層民衆處於極端絕望的狀態中，革命運動被鎮壓下來，軍事獨裁又壓到人民透不過氣來，民衆們看不出任何前途，於是宗教情緒便在奴隸、貧民和手工業者當中流行和加強起來，耶穌基督神的傳說就在這時被創造和流行起來。當時的一切歷史著作中，並沒有任何一篇文字有提到耶穌基督這個人，事實上，歷史上並沒有耶穌這個人，他只不過是人們所創造的神話中的人物罷了。不堪沉重壓迫的絕望的民衆從自身的處境中找不到任何出路，於是開始相信救世主會來搭救他們，在痛苦、失望和空虛的心靈中找到了希望。

救世主的觀念和信仰早在東方流行的猶太教中就有了，基督教是從東方的猶太神學和庸俗化了的希臘哲學中融合貫通而產生的，原始的基督教是奴隸和被壓迫的、痛苦的、顛連無告的平民的信仰和團結武器，仇恨和反抗奴隸主，其中也含有革命的因素，但基督教跟一

的旗幟下進行的，他們搬出原始的基督教來，對基督教教義按照自己的意思與御用教會作相反的解釋，它對推動和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封建統治階級的鬥爭是有一定的作用，我們在歷史上時常可以看到異教派的起義和鬥爭獲得廣泛的勞苦羣衆的支持，因而使革命運動獲得蓬勃的發展。

當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以後，基督教就被簡單地利用來作為管理的工具，作為籠絡下層階級的手段了。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宗教是社會壓迫的工具。大家知道在美國的一些州里，禁止教授達爾文的進化論，而對教會却採取十分鼓勵和扶助的政策，實質上這是一種精神虐待的政策，科學真理却完全被排斥出去。

其他的宗教，如同教、佛教、喇嘛教、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猶太教，在本質上同樣是起着反動的作用，和基督教是沒有兩樣的。

宗教是一門怎樣的哲學？

謝林

佛教的觀音菩薩，在中國唐朝甚至五代的時候還是一位有鬚子的英俊的男子漢，可是到了宋朝以後，却變成了一位美貌溫柔的女性，又比如羅漢，在印度和緬甸都是十六個，而在唐朝傳入中國後却變成了十八個，為什麼會多添兩個呢？因為唐朝當時有十八學士，為了符合社會要求，就多造了二個。由此可見宗教是在不斷發展中的。

四 關於基督教

基督教產生於奴隸制度的羅馬帝國內部，起初，羅馬帝國境內並沒有統一的神和宗教，各部族各有自己的僅在本區發生作用的神。

基督教是產生於羅馬奴隸制度的沒落時期，約公元一世紀期間。當時的社會風氣腐化到極點，皇帝個人有龐大的收入，而將一部份用在王室飲食起居的奢侈的生活上，另一部份為了收買人心，却花在羅馬市民的食糧和娛樂上。角鬥和流血是當時羅馬市民所喜愛的娛樂和玩意兒，浪費無度，窮奢極慾，沉淪於杯中物，羅馬暴君尼祿曾用大火燒掉羅馬的大部份建築物來娛樂自己，然後在廢墟上建造「金屋」（用大理石造），學習東方皇帝的奢靡生活，又學習埃及法老，強迫人民以他作神來禮拜的對象，慣于玩弄流血和殘忍的手段，倚恃暴力來維持統治。這種現象與帝國將滅亡而造成的頹喪的心理有密切關係的，自由農民紛紛破產了，貧困了，生產品的市場也萎縮了，生產力停滯不前，羅馬的整個社會走向衰弱，

一切宗教一樣，只能給壓迫者以空虛的安慰而已，很快地，基督教就被統治者、壓迫者利用了去，使奴隸們安於奴隸制度，習於服從，這樣一來，基督教就成為統治階級壓迫奴隸的思想武器了。

日益衰弱的奴隸制度的沒落和瓦解，使統治階級的生活日益腐化和走向神秘主義，他們覺得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世界末日的來臨。奴隸和平民的起義運動，野蠻民族（希臘人稱呼一切非希臘人為野蠻民族）的入侵，使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搖搖欲墜，更加絕望，更增強了神秘主義的情緒和「來世」的思想。沒落的奴隸主階級的這種情緒也反映在早期的基督教中。

自從基督教變成了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工具後，它的內容也就起了變化，原始基督教中的反叛、反奴隸主的因素被除去，有利於他們的統治的因素却被確立、馴服、順從、俯首聽命、服從最高權力，這就是為什麼統治階級支持和利用基督教的原因。

到了封建社會時代，封建社會關係的等級制度也反映在基督教中：如以上帝為首的一羣天使，使徒，天使長等的教階制度。基督教會擁有大量的土地，剝削着農奴，奴隸，是最大的封建主，基督教是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在這時期的農奴和城市貧民就採取異教和教派鬥爭的形式來反對地主階級及封建制度和佔統治地位的教會。

初期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宗教

五 宗教是最保守的反動的意識形態之一

在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在科學極度發達的太空時代中，為什麼宗教仍舊統治着千百萬人的思想呢？甚至還有那麼多的資產階級的學者、文化人、科學家、藝術家也相信古代野蠻人所創造的宗教呢？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及生產規律的自發作用，人們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自發力量面前的表面上的無能為力，就因為這個原因，宗教不僅在被壓迫的勞動羣衆意識中滋生着、保持着，而且在佔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的意識中滋生着、保持着；其次，對人民羣衆的社會壓迫，也是宗教存在的根源；再次是剝削階級千方百計支持並傳播宗教，因為宗教是能麻痹人民羣衆的精神，對統治階級有利。

六 教會是奴役機器的一部份

例如天主教教會的中心——梵蒂岡，就是一個最大的資本主義的商店、銀行、企業、飯店，甚至妓院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企業共有者或佔有者，梵蒂岡曾公開支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公開支持侵略戰爭，從來就沒有抗議過侵略者的可怕的野獸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梵蒂岡曾要求寬恕侵略者，說他們無罪，極力為他們狡辯。

梵蒂岡擁有龐大的分支機構，執行着奴役勞動羣衆的職能，幹着

間諜的勾當，使它臭名遠揚，例如匈牙利大主教明曾蒂和格雷斯案件，捷克、波蘭、保加利亞、中國對間諜和破壞者——天主教神甫的審判案中完全說明了教會是怎樣的一種骯髒的工具。

其他的宗教，如同教和佛教等也一樣，利用「陰間」和「天堂」這些虛構的東西來毒害羣衆的意識，使他們離開爭取幸福生活的真正道路。

七 宗教是與科學對立的

宗教和真正的科學是互相排斥的，無論那一種宗教都是敵視科學的。

科學，是關於自然和社會，關於它們的發展規律的客觀知識，這些知識的真理性是經過實踐檢驗過的。科學是以真實的知識來武裝人們的頭腦，喚起人們的自信心，使他們相信人類的理性，增強他們對自然和社會控制的能力。但宗教却完全相反，削弱人們的自信心，認為人們是軟弱無能的，不能控制自然和社會，只有神才能拯救他們。

科學一步步地摧毀着宗教的基礎，隨着科學的發展，宗教理論已經沒有可能站住腳了。譬如，如果真的有天堂，那麼火箭和太空船該可以到達，人們該可以找到在天堂的上帝和玉皇大帝，然而，事實如何呢？

資產階級為了生產，不得不發展科學，另一方面却又保持宗教的優勢，並利用科學發展中的困難作出有利於宗教的解釋。

八 消滅宗教是進步人類的歷史任務

從國家的立場來說，信仰什麼宗教是個人的私事，任何一個公民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權利，一切公民都有舉行宗教儀式的自由，國家必須予以尊重和保護。但任何人也有宣傳和反對宗教而做為一個無神論者的充份自由。

對於進步人類來說，跟宗教成見進行鬥爭不僅要通過教育，宣揚科學的世界觀，而且要吸引廣大羣衆參加改造社會的積極鬥爭。要徹底克服迷信，宗教和神秘主義，就要消滅它的社會基礎，我們知道，舊制度滅亡了，舊的思想意識形態，包括宗教在內是不會立刻消滅的，因此和宗教成見進行鬥爭是長期的。

幸福的生活是千百萬勞動羣衆爭取來的，不是虛幻渺茫的「上帝」賜予的。而這個光榮的歷史任務是進步人類和全體勞動人民的任務，我們知道，在進步人類所掌握的政權之下，不但會發生偉大的經濟革命，也會發生無可阻擋的偉大的文化革命，那時，作為歷史和自然界的自覺的真正的主人翁的人，任何宗教觀念將要歸於消滅。

新加坡人民的反殖運動

編者按：馬大社會主義俱樂部、工藝學院政治協會、南大政治學會、南大社會科學研究會、馬大社會科學研究會，于本

月十五日假南大文學院禮堂聯合舉行「星馬經濟政治的前途」的座談會，本文是本會代表李其木的演講詞。

我們的時代，是兩個對立的社會體系鬥爭的時代，是民族獨立運動新興發展的時代，也是殖民主義體系正在崩潰的時代。

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利用世界大戰來解決利潤分配不平衡的結果，是在戰爭中削弱了各自的力量；另一方面，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類却在歐、亞及非洲、美洲，相繼的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或建立起新生活。現在，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已經發展到另一階段，它不單是伴隨着世界大戰而產生的；而主要的是在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及科學技術的競賽和鬥爭中被打敗而產生的，也是在和平力量的充分發展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高漲的情況下而產生的！

我今晚要談的就是：新加坡人民的反殖運動，它是泛馬民族獨立運動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我們和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人民一樣，正在為摧毀殖民主義體系即瓦解帝國主義的根基而努力，我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我們的鬥爭是和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分不開的。

新加坡的反殖民主義運動雖然是馬來亞民族獨立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可是它又有着自己的特點，這特點是與新馬被分割同時俱來的。

誰造成新馬的分離呢？只要稍微有點歷史知識的就應懂得是殖民統治者造成新馬的分離，而且它今天還在妨礙着新馬的真正統一。

造成新馬分裂的另一原因是由於右派向統治者投靠所致：一九四六年封建貴族叛賣了人民，支持不合理的「聯合邦協定」，讓新馬被分割；一九五六年的英馬憲制談判，右派再一次放棄爭取國家統一的努力，向殖民主義妥協，造成新馬的分治。

由此可知，殖民統治者分而治之的反動政策的主因，再加上右派及封建貴族向殖民統治者妥協退讓的態度，互相起作用，造成新馬分治的現實。

因此，新加坡人民的反殖鬥爭便和爭取祖國統一的鬥爭結合了起來。所以，任何有歸新馬統一的憲制安排，一定要有利於兩地人民的反殖事業。

我們要談新加坡人民的政治運動，不得不瞭解集中表現了新加坡的政治運動的憲制鬥爭；要探討新加坡的憲制鬥爭，不得不追述人民行動黨的興起及其沒落。原來，人民羣衆的反殖民主義，爭取獨立的

運動，曾經造成了行動黨的發展，而行動黨也在一定的歷史範圍內給與人民大眾反殖運動的壯大起了「催化作用」，所以，研究行動黨的發展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代表羣衆政治運動發展的一個組成部份來看。

隨着新馬的被分割，緊急法令橫行下的全馬來亞，無數愛國人士被瘋狂的殺害和逮捕；許多進步的社團被解散及摧殘，面對這殖民地主義者違反歷史的反動血腥統治，全馬人民展開了一連串的各種形式的反迫害鬥爭。

經過了緊急法令實施的暴風雨後，新加坡的羣衆運動受到暫時的挫折，但是羣衆運動是不會靜止的，經過一個時期的沉靜，羣衆的力量有了新的發展，並在國內外有利的局勢驅使下，在獨立運動中起着橋樑作用的學生運動，開始在新加坡進一步的發展，一九五四年，「五一三」的華校學生免役請願事件，算是人民運動復興的號號。這時，任何有眼光的人士，都能覺察到當時的新加坡正在形成一股強大的反殖運動。不只在學生方面；工人、農人運動也在抬頭，並且成為反殖運動的主流。一九五四年的亞洲及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空前發展，隔一年的「亞非會議」，就是民族獨立運動的歷史性會議，這些時候，西方陣營的第一等強國——美國，不能贏得朝鮮之戰；同時，在美國全力軍事支持下，終是無補於法殖民主義者在安南戰場上的失敗，英國眼見自己的盟友節節失利，知道本身在馬來亞是沒有辦法獲得軍事勝利的把握。由於國內外的局勢的充分有利於新加坡人民的反殖事業，所以，作為團結人民反殖運動在憲制鬥爭這一戰線上的羣衆組織——人民行動黨，便應運而生，一九五四年底行動黨成立了。行動黨是反殖鬥爭全面開展後的產物，無可否認的，行動黨一開始便負有反殖的強烈色彩，她的下層支持者，幾乎都是熱愛祖國獨立的人們，而她的上層，有一定數量的領導者是來自人民羣衆的，他們在各方面都不愧為羣衆的領袖；但也有一部份行動黨上層，一開始便抱着機會主義的右傾思想，但是他們當時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包辦整個黨務，對黨還沒有絕對的影響力。因此，行動黨在羣衆運動中便擁有很大的威信。在林德憲制下的立法議會，行動黨的立法議員雖然只有三位，可是三個議員的行動黨竟比當時任何一個政黨更有力量來動員廣大的人民羣衆，而廣大的人民羣衆因有了行動黨這一憲制鬥爭的組織，也給他們的發展帶來了極有利的條件。加速了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反黃運動的一起發展，形成了多式多樣，波瀾壯闊的人民反殖鬥爭！

人民力量發展的結果使新加坡出現了爭取「猛迪卡」的偉大場面；可是殖民主義勢力却在暗中進行着撲滅羣衆運動的陰謀。

經過一九五六年的「九·一八」及一九五七年的「八·二二」逮捕事件後，人民運動遭受兩次的反動掃蕩和鎮壓，人民組織受了摧殘或封閉，羣衆領導層呈現空缺。本來，當羣衆運動蓬勃發展時，右傾的機會主義者的論調是難以立足的，可是，當羣衆運動遭受暫時挫折後，右傾機會主義的歪論便出現了；這時，他們便填補領導層的真空，提出違背反殖的基本立場和原則的右傾政策。把右派的反對新馬統一的論據：什麼「華人太多」、「左翼太多」，接受過來，以便把理論鬥爭的箭頭，射向新加坡的華人及左翼，作為「爭取合併」的工作路線。

其實，反動的鎮壓與掃蕩，是只能引起全民的憤怒，只能使反動政權替殖民主義服務的本質更為暴露而已，人民經過暫時的挫折後，馬上進行調整，把力量恢復起來，迎接自治邦的第一次大選，以便正式宣佈反動政權的滅亡。

一些右傾機會主義者，眼看這次大選將對他們有利，因此，重新改組行動黨組織，並且把許多失去了反殖鬥爭的精神實質的政策與計劃提出，貼上社會主義的商標，作為執政後的右傾政治理論上的根據及準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行動黨比起刀鋒上染着人民鮮血的右派，算是進步的，所以，人民在無可更好的選擇下，便全力支持行動黨，並且對行動黨的五年計劃寄予很大的希望。這樣，（上層右傾而下層左派的）行動黨就上台了。隨着行動黨的上台，右傾政策當然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而引起黨內下層及羣衆的反對，便是勢所必然的了。可以說：行動黨的分裂，引起左、右翼陣營的重新劃分，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根據行動黨脫黨人士的分析：執政後的行動黨政府，右傾政策接二連三的出現，什麼所謂「重要」的問題都提出來：「實現合併」，很重要！「建立馬來亞民族」，這是「社會主義在新馬產前的陣痛」，也是「為未來的歷史造型」，更是重要。……什麼都重要，可是殖民地人民的最重要的任務——反殖鬥爭，却說不重要。進一步連剷除殖民主義勢力的工作也要停止，什麼「三角鬥爭」、「五股勢力」等投機論調公開宣揚，把殖民主義勢力排到所要反對的後頭，企圖否定人民的反殖鬥爭，而行動黨進行反殖的腳步，就和羣衆的起了差異。好了！行動黨便從此自動肯定了她不能作為羣衆運動在憲制鬥爭戰線上的發言者，而她作為政治穩定的因素，作為新加坡政治發展的積極

力量，也因此消失了。

我們知道：新加坡的羣衆是不允許右傾政策的，更不允許人民鬥爭的果實被偷竊，羣衆運動在當前已走上新的第一步，要求重新建立一個左翼政黨，來作為憲制鬥爭的這一戰線上的有效武器，所以，無可避免的，「社陣」成立了起來。

其實，新加坡人民是走在憲制進展的前頭，那一個政權會垮台，不必等到大選，早在羣衆中肯定了；那一個政黨將興起，也早在羣衆中「註冊」了，可以肯定：未來星加坡的政壇上，將不僅是口頭的反殖而且要實際上反殖的政黨，才有發展的光明前途。

現在，讓我引一段行動黨的建黨宣言吧！它說：我們認為：真正代表馬來亞人民利益的政黨，他們今天的迫切任務，應該是儘速終止殖民地主義，任何政黨，倘若其宗旨是在發展或改良殖民地主義，那麼，他們不僅是在欺騙自己，同時也是在愚弄人民，事實告訴我們：殖民地政府乃被用來作為建立與扶持殖民地性質的經濟與政治的工具而生存。任何花言巧語及表面的粉飾，都不可能掩飾殖民地主義的反動本質。

好了！這不是明白的告訴了我們；任何改良政策，任何右傾機會主義政策，都是絕不可能改變馬來亞的現狀的。不幸的是：戰前到今，還有許多政黨及政治家相信可以通過改良的方式，自然而然的促使馬來亞的殖民主義步上絕境。其實，這種對殖民地社會的本質毫無認識的看法，無疑是在助長殖民主義的發展罷了！

四

我們既然知道，行動黨的分裂引起了左右翼陣營的重新劃分，而「社陣」的成立又使新加坡的反殖運動步上新的路程，所以，我們便不應悲觀，以為左翼分裂了，力量分散弱化了。其實却相反，認清反殖道路上的障礙，正是有利於人民力量的進一步發展，更有利於人民去決定自己的前途！

新加坡的前途怎樣呢？誰都知道：新馬政治形勢的變化，加上整個國際形勢的變化，都有利於爭取民族獨立運動，而不利於保存殖民統治，所以，英國不得不在新馬作政治上的讓步，不能不答應聯合邦的獨立及新加坡的自治，但是必須指出：英國所准許的獨立與自治還不能符合新馬廣大人民的願望。

為什麼呢？因為新馬今天還被分割。而所謂「獨立」與「自治」只不過在英聯邦內極有限的獨立與自治罷了，人民不能真正掌握國防與外交，甚至連處理內政的完整權力也沒有。因為，獨立及自治後的新馬，還保存着英國的軍事基地，而英國軍隊照樣在我國的土地上駐

紮。英、美的殖民地經濟勢力到今天還是兩地經濟的操縱者。所以，不論從政治上、經濟上來看，新馬還未完全擺脫殖民統治者的影響和控制。因此，那些大唱「通過合併而能得到獨立」且能「徹底消滅殖民主義勢力」的人，假如不是橫起心來欺騙人民，我們不禁要問，他們是不是對新馬當前政治常識的無知呢？！

我們認為1963年的憲制談判，新加坡爭取一個「完全的內部自治」是正確的，理由有三：（一）它符合憲制鬥爭的原則，憲法上規定目前的殖民地性質的憲制要受檢討，「三須古」的自治的進一步，最低限度當然是「函巴朗」的自治了。（二）爭取內部自治是有利於反殖鬥爭，也有利於改善人民的生活，目前的憲制給予殖民統治者太多的權力，致使有利於人民的內部措施都要受限制，人民的生活要改善，人民反殖的運動要推進一步，就要取得完全的內部自治權。（三）爭取完全內部自治給新馬的統一帶來了有利的條件。

在新加坡擁有完全內部自治權力的基礎上，我們完全同意「邦聯」形式這一過渡到兩地合併的憲制安排，在過渡期間，兩地政府締約處理有關的外交、國防問題，而且可以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取得聯繫，促進人民的團結，以便儘早實現新馬的統一。

假如新馬通過「邦聯」方式達到統一，我們更是贊成，這樣，在未來的馬來亞聯合邦中，新加坡應取得一州的地位，新加坡的公民自動成為新聯邦的公民，按人口比例選派代表出席新國會。

新加坡以一州地位加入聯邦前，應先來一次大選，讓人民作公開決定，並選出真正的人民代表，着手安排「邦聯」方式的憲制部署。

五

新馬真正合併，只是新加坡的憲制地位提高一級，並不能說明殖民主義勢力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完全消滅，只要外國軍隊還存在一天，只要不平等條約還保存一天，只要殖民主義勢力還餘留一天，我國人民的反殖鬥爭是不會停止的！

新馬合併後，新加坡人民的反殖運動將和聯合邦的社會主義運動結合起來，建立起一個真正社會主義者的大同盟，發展一股社會主義的洪流，通過憲制鬥爭的方式，擊敗反動勢力。

最後，我們知道：新加坡的反殖運動是在與殖民主義勢力鬥爭中發展起來的，它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難與阻礙，以便和長堤彼岸的社會主義運動結合起來，我們相信：在國內外有利人民反殖事業的形勢底下，人民是一定能夠建立一個和平、獨立、民主和統一的馬來亞的。